

破底超限：薄熙来事变之“逆世流危搏”的教训（一）

夏

刚

惊天沦落的升级：严慰冰匿名信中伤政要和薄谷开来下手毒杀英商两案对照 ——兼论暗含“魔鬼·神灵”的细节精神对辨别史实、 审视“罗生门”的重要性及启示作用

2011年11月13日晚，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之妻谷开来及薄家勤务人员张晓军在重庆南山丽景度假酒店投毒杀害英国公民尼尔·伍德，谷归案后招认是出于该商人与她和亲生儿子薄瓜瓜的经济矛盾激化并危及曾由他任海外监护人的其子之人身安全。应谷要求伙同灭迹的副市长兼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18日火化遗体后用“红机”（保密电话）轻巧地告诉她“化作青烟，驾鹤西去”，供认不讳、官方认可的动机不知是否有当局忌讳而不便端出的隐秘被黑箱操作而灰飞烟灭，但单凭中央政治局委员夫人动手谋杀外国人就足以可谓有辱中共形象的空前特大丑闻。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领导人》（1982年。通译《领袖们》）第七章《周恩来》中盛赞故人的才智、风采，第二节《儒者的礼让》又记述1950年代分管远东事务的副国务卿鲁滨逊在肯定其魅力的同时，称此公曾亲手杀人并抽着烟悠然离开作案地点。¹⁾其事实为1931年4月25日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别行动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后，周在上海紧急召开中央特别委员会扩大会议部署转移一批中央秘密机关，为防知底细的一帮顾家人跟随出卖而前往确认何去何从后当即由特科“红队”人员封口，但所谓“灭门血案”之称因勒毙不见血和周坚持放过了两名他认为无辜的孩童而不准确，且顾妻及远近亲友等的十来个成年人归西时他在楼内别处而未下手或目击，吴基民著《周恩来与上海灭门血案》〔台北〕一桥出版社，1998年）的正面（兼指不回避和加以肯定）详述中，抽烟也只是当惊闻顾背叛后惘然若失中破例地向特科精英陈养山要了支烟抽了几口，因平时绝少抽而笨拙地呛了一阵。²⁾时隔许久或秘而不宣的史实细节难于查证而不免众说纷纭或走样失真，在不可能全知真相、原貌的情况下退而求其次时，有必要注重次要的表层情节是否符合或接近主要的本质真实。亲手杀人及吞云吐雾地扬长而去这两点以讹传讹暴露了彼岸政要的皮相、无知，曾供职上海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部、市文史馆的纪实文学作家从当时杀

手洪扬生等人处取材而成的上述作品，则富于活灵活现的临场实感并令人信服地勾勒出周在坚强党性与温馨人性纠结中的决断。

《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和《礼记·梁玉藻》都有主张“君子远庖厨”，周似乎体现了其各举作理由的“不忍见其死”和“凡有血气之类弗身践”。然而到场的干将陈养山在1978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恢复后任副检察长（1979—82），力主斩草除根、协助指挥“监斩”的康生更是1934年入政治局、“文革”中升任常委乃至副主席。非常时期中非常事态导致非常人物为非常任务采取非常措施的非常事例，和古代朝野灭门成风、其时各方杀人如麻相比都不算惊天动地，但国民党等敌对势力以此给周及共产党抹黑也说明政要亲涉杀人事关名声。蒋介石1912年1月14日在沪军都督陈其美的指使和光复会叛徒王竹卿的随同下，潜入上海法租界内广慈医院的病房枪杀了该会领导人陶成章，李敖、汪祖荣著《蒋介石评传》〔台北〕商周文化事业公司1995年刊，〔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年刊称：他死后当月出版的《总统蒋公哀思录》（总统蒋公哀思录编纂小组编，〔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5年4月“恭印”）中的《总统蒋公年表初稿》，就从底本的吴敬恒（稚晖）纂《蒋总统年表》（1964年刊大本线装）所写“陶成章谋刺陈其美，破坏革命，公怒杀之”里删去了“杀”。³⁾其实事过31年后1943年7月26日蒋在日记（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公开）中坦言不讳：“看总理致吴稚晖先生书，益愤陶成章之罪不容诛。余之诛陶，乃出于为革命、为本党之大义，由余一人自任其责，毫无求功、求知之意。”⁴⁾而对比素不用枪甚至佩枪、见警卫干部手提刚枪杀后血淋淋的家雀就大不忍地以手遮脸赶紧叫拿开的毛泽东，⁵⁾联系《孙子兵法·谋攻篇》所云“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就不妨从毛最终打败蒋及凌驾于周的结局感到亲自出马杀人为下之下、遥控隐蔽灭敌为上之上。

“文革”中无数逼死人命都未闻有政要到场给自己手沾上鲜血，建政后政治局委员夫人（不含本身居要职的“文革”初期的江青等）的“作案”，也只有林伯渠之妻朱明1954年匿名致江青信揭其往昔风流丑史、变节污点，⁶⁾及陆定一之妻严慰冰至从1960年3月起给林彪一家写几十封攻击人品、挑拨是非的匿名信。涉世未深的朱在丧夫的第二年（1961年）东窗事发后立即自杀，身亡后仍在“文革”中被“四人帮”一伙定为“反革命分子”；⁷⁾神经偏执的严在1966年初最后一次施放暗箭后不久被公安部归案、受党中央处理，4月28日由专案组从中南海增福堂诱捕关入北京灵境胡同一号看守所（翌年2月11日移送关押最高级别犯人的秦城监狱内的99号单身牢房，被安上“6707”囚号关押至1978年12月1日），⁸⁾5月中旬林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即将被撤掉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宣传部长等职的陆咆哮：“我林彪恨不得一枪打死你陆定一！”⁹⁾痛恨却不得整死严恐怕也是顾虑担上报复的恶名得不偿失，何况严直到林彪事变后共身陷囹圄近13年，由此及朱42岁弃世都可知专政铁拳下、牢笼中往往生不如死。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会上对严的行径一致表示强烈愤慨的高干中军方尤为气势汹汹，和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元帅、

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萧华上将等一道责难的代总参谋长杨成武上将，索性走到陆跟前正告“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甚至把拳头伸到他眼皮下示威说“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¹⁰⁾

时任总后勤部部长、后成“反革命集团”主犯而被判16年刑、剥夺政治权利五年的邱会作中将，在去世八年多后问世于香港的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中记述了周恩来对此案的空前的严肃态度，称在会上对陆不仅批评、痛骂，还激动得把喝水缸子砸到他坐的那边去了；“总理批评严慰冰这种行为，不仅在共产党内不应该有，就是在国民党内也是少有的；是国民党少数特务才能干出来的下流手段。在我们党内发生这样的事，并且还持续了几年的时间，这不仅对林总不应当，对任何人都不应当。把国民党的下流手段搬到共产党内部来，是对党的破坏，完全是反革命行为。对这件事，应当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¹¹⁾“文革”期间林彪麾下“四大金刚”中名排最后的邱当时离进入党内高端中枢还差一大截（翌年武汉“7.20事变”之际受林及江青委派送信才较近、较密地接触而加深了毛对他的印象），但“总理这样发怒，以我所知是空前未有的”之言却并不因其见闻有限而让人感到夸张。以高度的君子风度、首脑气量著称的周平素批评属下时最多说“滑稽”或“胡闹台”到头，摔东西撒气之举仅见于“文革”中的秘书纪东著《难忘的八年》（[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披露的一次——1972年他支持认为林彪一伙为极左的看法并推动清除极左势力，但“四人帮”说林是“极右”而批周反极左的做法，其间一次他在办公室特意拿出一份文件看了后啪地朝侧右后方摔去，还用“国骂”怒言“妈的，怎么不是极左，就是极左嘛”。¹²⁾和受压之余（实为毛泽东对围绕批极左思潮的分歧作出“裁决”）关起门来骂娘、摔纸不同的是，这次周在顶层会议上当众冲着资深政要以上纲到敌我矛盾的断罪严词大发雷霆甚至砸茶杯，说明肚量能撑船的温文宰相也被非同小可的荒谬出格激得怒发冲冠而不得不操刀“宰”人。

1968年8月从中央警卫团调任周秘书、后历任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指挥学院副院长（少将衔）等的纪东，还追忆一次周在会上遭“四人帮”借着毛的批评进行名为“帮助”的围攻时向人要了一支烟，从不抽烟的他拿在手里，最后把它揉得粉碎。“是不是他自己心情的一种写照”这一推测恐怕只有天知道答案，而所称从未见过周在北京、中南海的任何场合抽烟，考虑到他伴随的七年零五个月是周生涯中极度紧张而终被累垮的特殊艰难岁月，也可作旁证来否定曾抽着烟悠然离开杀人现场的不实之说。尼克松在《领导人》中还引国民党政权要人根据和周打交道而得的经验谈，称用不了几天就开始怀疑或有善意的此公为意识形态似乎是盲目的，“而且没有诚意，都是表演。周是伟大的演员。刚才还在笑，马上就会哭。观众也会跟他笑，跟他哭。”¹³⁾ 刨除其中强烈敌意、绝对断言的成分则不妨肯定对周的表演力、感染力的估价当属不错，周在政治、外交舞台上为保党、维国或护己、助人善于作秀甚至作戏的高超技艺已成传说，因此对其言辞、情感的超常表现不妨亦视为出神入化的出色表演加以欣赏和回味。

那个时代政要在会上拍桌、摔杯的“闹台”（借“胡闹台”字面指在台面上闹）并不稀罕，

周在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1968年10月13—31日）的小组会上“严厉批判”几位老师时，就说1967年1月在军以上干部参加的高干座谈会上他们怪“中央文革”，“叶剑英拍桌子，把骨头都拍断了，桌上的茶杯都震到地上，引起了很多人不满”；“两个元帅带头大闹怀仁堂，叶剑英在一个小时就拍了十多次桌子”。¹⁴⁾ 为避免自己被视为“二月逆流黑后台”、老师们被打成“反党集团”的小骂大帮忙，就是不咸不淡地拿这类可放大又可化小的明面表象来凑数（总共讲了30个问题）搪塞，犹如往昔衙役遵命打板子时手下留情而看似使劲、听来响亮却仅叫表皮出血、不伤及筋骨。全会后军委办事组整理的《“二月逆流”反党集团在军内活动大事记》中，也称叶剑英等从“大闹京西”到西山（军委机关要地及要人住地）聚会，煽动军队“四反”（反毛、林、“中央文革”及“文化大革命”）气焰十分嚣张，“他们天天骂人，拍桌子、摔茶杯，叶剑英还把手拍骨折了。”¹⁵⁾叶猛拍桌而致骨裂之事发生于1967年1月20日在京西宾馆举行的军委扩大碰头会上，《叶剑英传》编写组著、[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刊《叶剑英传》详述这一著名场面，称为了躲避造反派抄家、揪人而外出避难的萧华来后，徐向前问他昨晚去哪里了，见他躲躲闪闪的就生气地说：“你是胆小鬼！你怕什么？他们能把你吃掉了吗？”盛怒之下拍了桌子，把茶杯盖子和碟子都摔了。叶面对江青的查问也大声说：“他昨天半夜里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收留下来的，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担当！”说话间按捺不住怒火，猛拍桌子而伤及右掌，回家后端茶杯觉得右手无力，秘书陪去拍了片子才发现右手掌骨远端骨折，“可见当时气恼之极，用力之猛！”

周恩来所谓叶“拍桌子，把骨头都拍断了，桌上的茶杯都震到地上”似乎不是同一天的事，因为《叶传》不可能在描绘这个亮点中放过如此生动传神的行为表现。也许他是把叶在高干座谈会上的作为或徐向前的上述举动搬来，而徐“把茶杯盖子和碟子都摔了”在《徐向前传》（国防大学编写组，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中作“茶杯盖子摔到地上”。《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的“摔”字条目，释义作“**扞**①（身体）失去平衡而倒下。②很快地往下落。③使落下而破损。④扔。⑤摔打①”（“摔打①”意为“抓在手里磕打”），前带表示处置或致使的介词“把茶杯盖子和碟子都摔了”似指③或④，“茶杯盖子摔到地上”则因能动、损坏的成分不鲜明而似属②。陈扬勇著纪实文学《苦撑危局——周恩来在196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的描写是：“‘啪！’徐向前怒火冲顶，狠劲一掌击在桌子上，茶杯盖震起来老高，又在桌面上弹了两下，滚落地上摔了个粉碎。”对应③的这一光景须有用劲大而巧、桌面反弹力高、地板上无地毯等条件方能顺利成立，仿佛亲临其境或验证无误的描绘过于精密而反让人怀疑“老高”、“两下”、“粉碎”的可信度，看来邓小平关于总结历史问题所提倡的“宜粗不宜细”对记述历史场面也不无启示。邓在1978年12月1日政治局常委召集部分大军区司令员和省委第一书记打招呼会上，首次提出“历史问题只能搞粗，

不能搞细。一搞细就要延长时间，这就不利。要以大局为重”，接着称清华大学几个青年贴大字报说的“反周民必反，反毛国必乱”是水平很高的话，¹⁶⁾旨在阻止对毛泽东“妖魔化”的这条指示显示出他也深知“魔鬼（亦作‘神灵’）寓于细节”（生于“文革”爆发100年前的德国艺术史学家瓦堡[1866—1929]的命题），而再现历史情节时太追求精细也会受到魔鬼的捉弄而过犹不及的反倒比粗枝大叶更多不宜。

在此值得注目李晓航的论考《质疑叶剑英“大闹京西宾馆”流传甚广的一个细节》（林彪事变37周年[2008年9月13日]问世的民办“文革”研究专题电子刊物《记忆》2009年第11期载），这位“文革”史研究者针对3种出版物的说法——《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社会主义时期）》（[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中“二月逆流”词条的“把右手掌骨震裂”、《聂荣臻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的“右手掌骨震开了一条裂缝”、《叶剑英传》的“右手掌骨远端骨折”，称年初偶见1967年3月21日的军中老照片而生疑“叶剑英拍桌导致右手骨折吗？”（副题），其后查得同年2月3日陪毛见外宾的合影上同样未见石膏或夹板、2月工作照上右手握笔批文，并联系《叶传》记述2月14日“大闹怀仁堂”中他站起来对康生一伙拍桌子说“你们把党搞乱了”，以“伤筋动骨一百天”的常识和指出“右手掌骨远端骨折”之说法不准确（“掌骨”前应有第几）的骨科专家的指教，判断不久后与外宾握手、写字和拍桌子说明1月20日右手骨折疑为误传，其原因或许是官方出于政治需要把叶拍桌子说成是针对江青，有的作者出于对江的义愤臆造出这个情节，为着强化愤怒情态而显示义正词严震住了江，但实际上叶拍桌子是针对徐向前。“这一细节虽无关宏旨，但历史是由无数真实细节串联起来的，一个细节的失真，可能导致一个历史事件的扭曲。因此，记述历史的人，对每个细节都应持实事求是态度，不因善者彰其长，不因恶者扬其短，做到准确无误，经得起仔细推究。”（黑体字为本文作者所加，以下引文中亦然。）

以旧时真实写照否定官方说法的独立思考和周密考证都使人耳目一新，该刊物又载署名“一位知情者”的《读李晓航文》肯定其价值：“李发现三个‘权威’的作者和出版社，对文革历史上一个比较重要的事实，竟然有截然不同的记述。既然是截然不同，必有一个是假的。”这位不愿公开身份的“半个当事人”根据其时在西山几乎天天见叶帅的经历等称骨折是有的，并披露当时的保健护士说“做了像豆角壳那样两寸长不到的石膏托，然后拿纱布缠上，叶帅嫌麻烦，不方便，经常自己取下来”。作者同时喝破叶骨折后面的故事是胡编的，他是对在军队“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问题上态度不同的徐帅发火而拍了桌子；“文革”中面对面地对江青发火是没有的，“老师们都很老道，也知书达理，不看僧面看佛面”；“徐因‘张国焘’、‘四方面军’、‘西路军’等等历史一直小心谨慎，根本没有发火的资本和可能，所谓1967年1月20号徐拍桌子和大闹怀仁堂拍桌子都是假的。”还强调“文革”中高干（尤其是老一辈革命家）言行的重要因素是始终把维护毛主席放在首位，呼吁往往是先分了好人、坏人后再开始而势必“为尊者讳”的

“文革”史研究应回到起点，“好人也干过坏事。‘坏人’也干过好事；‘坏人’不见得没骨气（如公审中张春桥的表现），好人不见得都‘傲霜雪’（杨成武就是典型），‘坏人’不见得灵魂不干净，好人也不见得灵魂很干净。需要回到这样一个平台看文革。”这两个观点引起《记忆》同年第17期载读者陈闯创来信称深以为是的共鸣，陈对上述两文的推断和证据加以信任之余还提供了时任叶办秘书（按：实为下述引文所写的叶剑英办公室主任）的王守江的见证——2006年第40期[北京]《三联生活周刊》刊登的《1976年10月6日：中国政治大地震》一文中，他谈到1967年被“上海帮”激怒的叶一拍桌子将手拍得骨折时纠正了一个细节：“很多文章想当然地写成是右手骨折，他们不知道叶帅是‘左撇子’，是我带叶帅去的医院，骨折的那只手肯定是左手。”陈信结论为叶在那天会上对徐向前用左手拍了桌子并导致左手骨裂，最后又特意表明对官修史书善编假话的传统深以为非。

李晓航2012年8月5日将《质疑》一文收入博客时根据上述新材料作了修改，增加列举的三份文献中《苦撑危局》也称“右手的掌骨都骨折了”；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1984年编印《“文化大革命”时期资料选辑》所录《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几个问题》（作者谭宗级）写“把手指拍断了”，《徐向前（按：后应有“元帅”）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作“把手骨都拍伤了”，称六种出版物不约而同地提到叶拍桌子导致右手骨折，但令人费解的是对右手骨折的具体说法各不相同。作者在此疏忽了后两种文献未指明是哪只手（另一疑问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几个问题》的引号似应为本文上述修正的位置），而相形之下徐回忆“把手都拍伤了”堪称无可挑剔，不妨说像是文如其人的“小心谨慎”，由此也可知“宜粗不宜细”对细节经不起推究的风险有回避作用。以“宜粗不宜细”来看李文的这一瑕疵又可觉无伤宏旨，因为再对照《徐向前传》的“伤着了手骨”也能奇怪伤手骨的具体说法各不相同。军事科学院组织的《叶剑英传》编写组在叶生前采录56次回忆谈话，走访近千人并查阅军内外上百家档案馆等单位收存的史料，根据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精心写成的书稿又由军委和中央文献研究室审定，但刊行之年媒体登载原办公室主任纠正的右手骨折说还是不可思议地写进了官方传记。再玩味这一段中涉及叶的表述：“江青坐在叶剑英的左侧。她看到萧华没有来，阴阳怪气地故意发问：‘总政治部主任失踪，到哪里去了？’叶剑英正气凛然，不予理睬。[中为萧来后徐向前拍桌场面]这时，一直冷静沉默的叶剑英，面对江青的查问，也大声地说[以下为上引承认收留之言及“猛拍桌子，伤及右掌”，回家后发现骨折，可见气恼之极、用力之猛云云]一向和蔼可亲的叶剑英发了这么大的脾气，江青等人一下子被震住了，不再质问了，也不提抓萧华了。”试想如能掌握是左撇子而用紧靠江一侧的左手拍桌，岂非更有针锋相对、短兵相接的气势。

“一位知情者”所称叶骨折后面的故事是胡编的，本意大概是指拍桌之举除了导致骨折外其它流传至今的描述均属于虚乌有，反之可以理解为拍桌前的表现基本可信，但不知对《叶传》所

谓的“正气凛然，不予理睬”作何判断。三帅的传记或回忆录都写了江“故作姿态怪声怪气地”（《聂传》）问总政主任躲到哪里去了，对这一“火上浇油”（《徐回忆录》）叶无回应也都一致，但《聂传》、《徐回忆录》此处未提叶和包括自己的与会者不搭腔，其余文献也只有《苦撑危局》称叶对坐在左侧的江阴阳怪气地火上浇油“压了压火气，没予理睬”。比《叶传》的“不予”较为客观的“没予”之后的“压了压火气”又较之“正气凛然”更显示有意，而这两部书的共同点在于以此带主观想像味道的“添加剂”给故人的光环上再增一道亮丝。从“叶”、“西山”和“老师”、“二月”、“斗争”也能想到陈毅1966年作《题西山红叶》诗，起首的“西山红叶好，霜重色愈浓。革命亦如此，斗争见英雄。红叶遍西山，红于二月花”，借唐代杜牧《七绝·山行》的“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而在之后更“赤化”：“四围有青绿，抗暴共一家。红叶布山隅，中右色朦胧。左岸顶西风，欢呼彻底红。”接下去的“伸手摘红叶，我取红透底。浅红与灰红，弃之我不取。书中夹红叶，红叶颜色好，不妨用来形容**官方传记塑造老革命家形象时多见的求鲜亮、纯净的取舍标准及加工效果**。在“红（革命的）叶（剑英）”右手骨折的传说被证明失真的今天看来，再下面的“请君隔年看，真红不枯槁。红叶落尘埃，莫谓红绝矣”也饶有深意。当天和25天后都拍桌子这一无可否认的事实护住了叶帅刚烈的印象并应了陈诗其后的结尾：“明春花再发，万红与千紫。题诗红叶上，为颂革命红。革命红满天，吓死可怜虫。”

《叶传》称他拍桌为“面对江青的查问”之说，也是《苦撑危局》“苦撑”（勉强支持）为“针对江青的明知故问，高声怒喝”，上述《党史大辞典（社会主义时期）》（李践为主编）更以不见于另几种文献的言词拔高作：“叶剑英痛斥江青等人：谁想搞乱军队，决不会有好下场。”（显然是“大闹京西宾馆”和2月14、16日政治局碰头会上的“大闹怀仁堂”之间的时空穿越，《叶传》记述2月14日下午会上他站起来指着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一伙[可注意未出现江青的名字]，拍着桌子气愤地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聂传》则记述会议主持人徐向前在萧华来后问明昨晚他家被抄而非常气愤，“这时早已按捺不住心头怒火的叶剑英突然厉声痛斥道：‘他昨天半夜里[以下和《叶传》的相应部分一字不差]’”《徐回忆录》说听萧讲了昨晚被抄家的经过后，“我气得拍了桌子，茶杯盖子摔到了地上。叶帅气愤地说：萧华是我保护起来的，如果有罪，我来承担！他也拍了桌子”。（各文献中作“萧”、“肖”不等的姓氏写法，本文统一作规范的前者。）上述《“文革”时期资料选辑》中谭（历任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教授的党史专家）文称：1月20日上午传达毛泽东指示“萧华是个好同志”，“下午，康生、江青、陈伯达指示在会上攻击萧华，矛头对准几个老师，实际上是整老师。陈伯达、江青说总政是‘阎王殿’，半夜抄了萧华的家。北京军区造反派把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扣起来，叶剑英知道后很生气，开会时，拍桌子”，如此叙述难免会使不知情者产生20日夜萧家被抄、叶生气是对杨被扣的印象，

开会时间也和《叶传》、《徐传》等记述的上午有出入，而后三种说法至少在字面上没有指明叶怒发击案是直接针对江。那位“知情者”称当时在西山“躲反”（躲避造反派的批斗）的邱会作等人都是叶同意接上山的，徐知道后怕有“保”之嫌而不悦，19日下午叫邱下山，邱去告别时叶很生气；邱五天后（遭打成重伤）又被救出接到西山，下车时叶亲自去扶邱，“我就站在叶帅旁边”。李晓航博客发布的《质疑》新版本删去了叶发脾气、拍桌子是针对徐而非直接针对江的论断，而后三种文献细读起来意外地似乎都不构成对向徐发火之说的明确否定。

周恩来说叶“拍桌子，把骨头都拍断了，桌上的茶杯都震到地上”的最后一句，在上述六种文献中无一记载而当不是骨折之日的事；“两个元帅带头大闹怀仁堂，叶剑英在一个小时就拍了十多次桌子”这段又没有茶杯如何，若依据徐帅的回忆录、传记则可想到是否因周末目睹而把传闻的风波“徐冠叶戴”了。然而徐的这段光荣史中自述及传记、《苦撑危局》照写的“茶杯盖子”并非“茶杯”，《聂传》、《党史大辞典》、《“文革”时期资料选辑》则只字不提徐拍桌子。蹊跷的不仅是《叶传》添枝加叶地采用比徐回忆录、传记声色更壮的“茶杯盖子和碟子”说，更在于详写叶“说着说着举起右手，用力向桌子拍去”的《聂传》对徐没有同样待遇。聂当天无激怒表现而似乎相对于徐、叶处于较中立的位置，对徐“非常气愤”的描述以句号结尾而无动作后续便笔锋一转跳到叶发怒，就让人猜想“知情者”称徐决无可能拍桌子是否符合实情。如果其文断定的“胡编”不幸而言中则还能想到话语权归赢家又是古今中外皆如此，但这里还是以肯定徐追忆亲历讲述的言行属实为前提来点出宏旨，即同一史实细节在当事人健在时或死后不久编写或问世的多种不同文献中往往呈多样甚至相反，连权威性文献都不免出现差错、失实、掩盖、修饰乃至杜撰的情况使人难获确证、无所适从。

上述蒋介石在日记中承认的刺陶案及时代背景近见有记者施雨华《“刺宋案”罗生门》详析，民主革命家宋教仁被刺100周年的2013年3月22日发稿、[广州]《南方人物周刊》刊载的此文的标题中，源于日语的新词“罗生门”指当事人分别按自身的利益和思路来表述证明，各执一词而又都拿不出有力的证据，致使事实真相最终不得而知。《辞海》第六版（辞海编辑委员会编纂，夏征农、陈至立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的该词条，介绍根据芥川龙之介的小说《筱竹林中》和《罗生门》改编、黑泽明导演的日本故事片，可笑而可悲的是第二句“大映电影公司京都制片厂1951年摄制”就犯了低级错误，1950年8月26日首映的该作品当然不可能在下一年才拍，恐怕是把“获威尼斯电影节金棕榈奖和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最后一句）的年份想当然地搬来而致。代表国家最高水平的该辞书在2008年夏征农逝世后由历任教育部长、国务委员的政要继任主编，不惜以外行支配内行来加强党的领导后出现了不止一处的这类谬误，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目内的“二个特别行政区”之“二”应为“两”（《现代汉语词典》的“两”条目释文就在注意栏中说明“‘两’和‘二’用法不全都。[略]在一般量词前，用‘两’不用‘二’。”

无须对照“两！”义项①的释义“**数**一个加一个是两个”和“二”的“**数**一加一后所得的数目”，也能知道这个和“一加一等于二”一样简单的道理[本文中作者为示其例而特意将惯用的阿拉伯数字多改作汉字]；又如“明眸皓齿”条目引证曹植《洛神赋》文中的“辅靛承权”，把旧版按千古不易的原文的“靛辅承权”字序颠倒过来，这不能不说是**连文化、教育的神圣领域都被铜臭和浮躁习气污染的劣化倾向中冒出的咄咄怪事。**

1949—57年任总理办公室外事秘书、后任中央文献出版社社长的陈浩回忆周恩来作风，称他对自己的惊人的记忆力从不轻信，常常要查阅原著、资料、地图或《辞源》、《康熙字典》等工具书，对引语、马恩列斯或毛泽东的语录一定要查到原出处、找到原著中的有关章节，有时还要查清某事发生的年月日。¹⁷⁾以严谨著称、对文字别扭等马虎极不容忍的周有时会把某个部的文件摔到部长面前说：“这就是你们弄的文件，难道还要我来给你们当秘书吗？”“这句话就不通嘛。这件事就没有说清楚嘛。”为此叫来当着秘书面训¹⁸⁾和在国务院会议对答错指标数字等的正、副部长罚站¹⁹⁾之严厉，也可见在会上就严慰冰匿名信案痛责陆定一之狠、把喝水缸子砸过去之激动并非异常失控。他形容自己要批阅大量文件并作不少修改的日课说“我是一个语文教员，天天在那里改卷子”，²⁰⁾而这部兼字典、语文词典和百科全书功能的权威辞书在其逝世三分之一世纪后出这等纰漏，不知他在九泉之下是不是要叹息如今顶层政坛连“语文教员”都和社会上的雷锋一样罕见了（恰逢周65岁生日的1963年3月5日《人民日报》等大报发表了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而“文革”末期的道德风尚江河日下中邓小平1975年7月14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到，有个战士坐车不给抱着娃娃的妇女让座，娃娃哭了他也不理，旁边有位老人说“雷锋叔叔不在了”，称“从这个事情上是可以看出问题的，……如果认为这些都无关重要，没有警觉，那是很危险的”，²¹⁾寓于这一细节的“魔鬼”就是十年浩劫中“子弟兵”也开始从细微处渐失为人民的精神。)

1958年5月5—23日于北京举行的八大二次会议对“大跃进”作总动员并对反冒进作结论，在猛批反冒进之“右倾”甚至上纲到“反党”的过火斗争气氛中周被安排于17日再次检讨。时任其理论秘书的范若愚四分之一世纪后在《历史最终会把一切纳入正轨》一文中回忆：在整理由周口授内容的检查时写“我和毛主席风雨同舟，朝夕与共，但是在思想上还跟不上毛主席”，周审稿时对他加的两个四字成语予以严厉批评，说关于他和毛的关系在（延安）整风以后还可引用这成语，但在整风以前不能引用，“这也说明你对党史知识知道得太少！”从讲这些话时几乎流出眼泪和起草发言稿的十多天里又添白发，²²⁾都可见两位巨人之间的关系复杂和周受毛敲打的压力极大。兼给刘少奇当学习秘书、后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和党中央理论刊物《红旗》副主编的范被断言对党史知之不多，则要怪当事人用“防火墙”屏蔽往事深层而使核心圈外人或后世难以知晓。1917年9月周恩来赴日本留学时作七绝诗中有化达摩禅师故事的“面壁十年图破壁”，而在不须

“翻墙”即能获得大量信息的今天却不乏不加搜寻、确认就向壁记述、想必如此者。同以在京西宾馆举行的会议为例可举出何建明著《我的天堂》（[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年），这部长篇报告文学中的《邓小平在苏州首提“小康”概念》一节至今仍见媒体、博客原样转载，作者2012年12月3日在其个人博客上张贴时也没有发现和订正两处常识性的错误，一是把十一届三中全会写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二是把给邓当翻译的王效贤（1930—，河北乐亭县人，女）当成了男性。

“1978年12月，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召开了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全会，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难怪作者对这一表述充满自信和出版社、多家媒体的编辑及广大读者毫不怀疑，党中央在京举行的载入史册的会议选址人民大会堂这一“圣殿”似乎是天经地义，但早有多方披露会场是军委及党中央、国务院的高规格大型重要会议首选之一的京西宾馆。始称“八一宾馆”的该内部宾馆64年9月14日开业以来大门始终不挂标识而只有门牌（羊坊店路一号），属军队编制序列（总参管理保障部京西宾馆管理局）而有安全、保密数全国宾馆第一之称，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此召开除了规模适宜、管理便利等因素外似有军方色彩的微妙影响，被认为标志着“第二次解放”的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叶剑英等人势头压过华国锋、汪东兴等人，不无“枪杆子里出政权”（毛泽东语）后又以军队为坚强后盾改组靠武力维持的政权的气息。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后毛拍板、政治局通过由华任代总理、陈锡联负责主持军委工作，2月2日中央发出的关于华、陈任职的通知在后一项前有“在叶剑英生病期间”的状态，被“病休”的叶却因军中影响力大而在华、汪合谋抓捕“四人帮”时仍是非倚仗不可的主心骨。其坐镇怀仁堂诱捕政敌联系当年“大闹怀仁堂”则还能想到十一届三中全会选址的另一妙味，“老·帅”群体否定“文革”、纠正冤假错案的主张成为主流堪称“大闹京西宾馆”的翻本。和“哪里跌倒的，就在哪里爬起来”相映成趣的是可谓“哪里出发的，就在哪里继续”之重演：号称要开成第二个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2013年11月9—12日）也选址京西宾馆。恰于一中全会一周年的15日发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及习总书记的说明，也使出此决策的本次全会像是习近平体制针对腐败势力和利益集团试图变法维新的新起点。

另一历史连环的“天数”是闭幕日又逢给十一届三中全会开道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拐点坐标，整整35年前的这天陈云在东北组会上借“华主席讲话中要我们畅所欲言”而提出六大问题：（1）所谓“叛徒集团”的薄一波等61人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批准的，不是叛徒；（2）对在“文革”中被错定为叛徒的同志应复查，如无真凭实据则应恢复党籍；对中央组织部1937年7月7日及1940年作的关于所谓“自首分子”的决定中所涉及的同志，以及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敌我边缘地区的“两面政权”中做了革命工作的同志，要作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论；（3）陶铸、王鹤寿等抗战后我党向国民党从狱中要出来的同志被定为叛徒或在结论中留有“尾巴”，应由中组

部复查并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既有中组部又有中央专案组的不正常状态应该结束；（4）彭德怀对党贡献很大，其骨灰应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5）天安门事件是伟大的群众运动，中央应该加以肯定；（6）康生是“中央文革”顾问，错误很严重，中央应在适当的会议上给以批评。党内外极其关注的这些影响大、涉及面广的历史遗留问题如重磅炸弹引爆后会议空气骤变，陈坚持登简报印发的这番“开火”揭盖子有力地推动了以平反冤假错案为突破口的拨乱反正，其破（改“继”的创语）往开来后又演变为参与镇压“四五运动”的华国锋、把持中央专案组的汪东兴失势，主管中央警卫局多年、时任中央副主席的开国少将汪翌月交出中央办公厅主任职位给姚依林。这次会议开幕的11月10日是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3周年，“文革”前夜的同日由汪取代杨尚昆为中办主任也成为十年动乱发端的隐蔽政变，历史的风车从逆向再次回轮的该会（共212人参加）也是在京西宾馆举行。可容纳400余人的第一会议室正面墙上的巨幅长城图两旁的字幅“自力更生”、“艰苦奋斗”，²³在全国总体大致初步进入小康的今日看来像是对仍须习近平令行的勤政廉政的提醒和支持。

人民大会堂和京西宾馆的关系不妨视为党政中枢中南海和军委要地玉泉山、西山的对应，堂外有馆、“海”外有山的这部深奥的“山海经”也能算当年“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源头之一。上述作者不知京西宾馆承办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史实说明对有关报道、回忆录未加浏览或留意，超出对党史知识不熟、对政坛观察欠深的缺憾之根本还在于实事求是及求事实之是不够到位。即如下句“邓小平在会上再次向全世界明确地宣言：中国要在20世纪末初步实现现代化”，首先是在会上向世界明确宣言云云不符合会上发言在会期中未对国内外公开这一基本事实，能称会上向世界明确宣言的一般是全国党代会、人代会等上所作并当即发表的报告或讲话等；1984年5月25日邓在人民大会堂叫住港澳记者怒言耿飆称将来可不驻军香港是“胡说八道”，叫曾任副总理、国防部长（历届中唯一无军衔）、时任人大副委员长的该政要难堪的这番表态，因是会见港澳出席召开中的全国人大、政协会议的代表、委员时之举而算会期中向世界宣布（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即是《邓小平会见港澳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时强调 我国恢复对香港主权后有权在港驻军》）；2012年3月14日温家宝在全国人大、政协“两会”结束后会见记者时明挑王立军案同样如此；倒是次年8月22—26日薄熙来在一审法院通过官方微博转播陈述可够在庭上向世界宣布，这次庭审的首日和末日分别恰逢109周年、104周年诞辰的邓、耿掌权的时代则不这样透明。所谓再次宣言要在20世纪末初步实现现代化的不足之处还不止是未写明什么现代化，也在于上次宣言为何时不清楚和“初步”与其先前之言及本次会议精神都不相符。邓1975年3月5日刚在中共省、市、自治区委员会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上说过：“到二十世纪末，也就是说，从现在算起还有二十五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²⁴全会公报决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上来，指出“这对于实现国民经济三年、八年规划和二十三年设想，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具有重大的意义”。意味着争取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该决策由华国锋代表政治局提出，五位副主席中排在叶剑英和李先念、陈云、汪东兴之间的邓还未到代表中央宣布决策的地步。

该作品又写次年邓对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说起要用 20 年把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那时国民生活水平将达到可以吃饱穿暖，“我把这个叫小康”。“首相不明白小康是个什么概念，他将目光投向身边的翻译——时任中国外交部亚洲司日本处副处长王效贤先生。/ 王翻译紧张得差点出汗，是啊，小康是什么？他怎敢问邓小平，于是急中生智：‘就是……就是一个人身体恢复的时候。’王翻译心头暗暗寻思：日本人平时也讲小康，这样翻译首相应该明白一点吧。/ ‘噢——’首相似懂非懂地张了张嘴，似乎再也找不到合适的问题，然后起身笑咪咪地握住邓小平的手，说：‘祝您和中国人民早日小康。’”接着记述这次会见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邓开始多次在不同场合念叨着“小康”，“邓小平的家人告诉我，平时邓小平在家里不怎么说话，可有几回嘴里突然冒出‘小康’两个字来，让家人有时感到不知何意。”如此记述给人以“通天”印象的作者也许是对中层干部不熟而搞错了王效贤的性别，其实但凡注意到口译员多为被认为外语天赋相对高的女性这一世界性普遍现象而加以核实，就不难发现其照片及曾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的经历。当然这和 1992 年 10 月 19 日十四届一中全会后新政治局常委集体亮相时的笑话比就不算什么，江泽民在向中外记者介绍七人中排最后的胡锦涛时说“这个年轻人 50 岁不到，只有 49 岁”，外交部翻译室英文处副处长马雪松鬼使神差地译“年轻人”为“young women”（年轻女性），在场内 600 多名媒体工作者的哄堂大笑中江不无显本事地随即用英语纠正了他的口误，不料这个 26 岁的青年精英用英语复述江的订正后再次把“年轻人”说成“young women”。马事后解释说当时没看见胡长的是什么样，隐约当成了与他同时在团中央任书记（同任该职的时期为 82—84 年）的刘延东，²⁵⁾ 和低调“黑马”胡的知名度低一道形成误区的是外交官不谙政界的隔门（部门）如隔山，而对顶层政要不摸门也在于对政治局常委历来是清一色的男性这一党史常识缺乏了解。

20 年后十八届一中全会上“入常”呼声高的国务委员刘延东留任为 25 名政治局委员之一，上届委员中其余五位只剩最后一次机会的男性则都在“七上八下”的关门门前顺当地更上层楼，刘被同情为“失常”的着落其实符合“委”字所含的女性自建党来无一“入常”而属正常。十八大闭幕的 11 月 14 日新华社以快讯报导选举计票结束后胡锦涛宣布本届中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产生，但十七届政治局委员王岐山、刘云山、刘延东、李源朝、汪洋、张高丽、张德江、俞正声当选中委的报道旋即被删。²⁶⁾ 其中按姓氏笔画为序排两张及俞之前并连在一起的刘延东和李、汪三人“入常”落空，又在女性无缘政治局常委的习惯势力之外提示了毛泽东的幽灵依然徘徊神州不止。胡为推进廉洁新政、槟除老人干政而于 2003 年废除的夏聚北戴河的含元老众议 07

年复活，十八大前夕照开就使毛词《浪淘沙·北戴河》（1954年夏）的“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竟成讖语。毛泽东所称“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既未能改变男性“半边天”独顶“政常”的局面，也难以使正式出版物或重要场合中把男女性别说反的阴差阳错得到合理解释或温情宽容。把首译“小康”时年龄也恰逢49岁的“young women”王效贤女士不经意地写成男士的笔误，反过来又能从积极、消极的两种意义上使人觉得“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这一古训有理。此语出自吴承恩著《西游记》第二回《悟彻菩提真妙理 断魔归本合元神》里的祖师之口，对所称“将四海之外，一日都游遍，方算得腾云”连声叫难的孙悟空闻此言便礼拜恳求传授，遂得“捻着诀，念动真言，攒紧了拳，将身一抖，跳将起来，一筋斗就有十万八千里路”的绝招。对照明代小说家编织的该情节和宋代陈元靓《事林广记》第九卷云“世上无难事，人心自不坚”，毛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1965年5月）的“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可属正宗本意，而他在党庆37周年（1958年7月1日）写下的“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七律二首·送瘟神 其二》），又是体现“筋斗云”腾飞梦的“大跃进”的精神万能论、意志决定论的浪漫写照。次月27日《人民日报》刊出中共中央办公厅派赴山东寿张县了解情况的刘西瑞的来信，《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一标题作为助长拔苗助长之风的口号流毒甚广、甚深、甚久。

未接触过王效贤的何建明活灵活现、头头是道地写“他”差点出汗、不敢问邓和内心寻思，这就使人怀疑他笔下生花、纸上升华的次年那场会见（12月6日，于北京）的所有细节，如邓“看了一眼日本客人，没有立即回答，只见他缓缓地地点上一支熊猫牌香烟”是谁的见闻，又如大平听答话是否真的“两只耳朵竖得直直的，眼睛更是盯着中国的这位小个子巨人不放”。当然也不能否认给邓当翻译者必然紧张和这位“烟鬼”在外事活动中也会不在乎地吞云吐雾，更不会有录像或在场者证明日本首相的耳朵呈松弛而非竖直，但多年来不少纪实文学随心发挥、着意添加的弊病在这篇文字中不能说杜绝干净，不过和许多“秘史”等的粗制滥造、胡编乱造相比又未走上假话、大话、空话泛滥的邪道。记者李菁在《1976年10月6日：中国政治大地震》中再现抓捕时年41岁的王洪文的实况，按时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8341部队（中央警卫团）政委的武健华的回忆，写负责及执行者是第一行动小组组长李广银和队员吴兴禄、霍际龙、王志民，又引叶为和马姓女护士区别而称为“马头”的贴身警卫马锡金在中南海怀仁堂现场屏风后的观察：“‘因为王洪文年轻、有力气，前两个警卫没摠住他，他往前踉跄着冲了一下，后面又冲上来两人将他摠住。’马锡金说，‘后来有小报上写‘王洪文挣脱开，冲到华国锋面前、完全不属实，他的位置离华、叶他们还远着呢。’”马称“会议厅大概有200多平方米，中间是一张很长的条形桌，华国锋朝南而坐，叶剑英正在他的对面”，华居“面南为王”的上座与叶相对这样可供琢磨的场面也只是零距离旁观的证言才可信，“真相”二字都带“目”的组合结构作为“耳听是虚，眼见是实”之理的启示也意味深长。

“邓小平同时站起身，一脸笑容，并连声应和道：‘好好，小康，我们大家都小康。’”何建明所写大平起身握别时双方的言行、神态之难于全信是因为未标注基于见证的来源，不见于官方记载的这一整场话语哪怕是道听途说也还是明示获悉途径才能有立足的依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合办的中央级学术理论刊物《党的文献》双月刊，2007年第二期刊载《回忆70年代邓小平访日和会见大平正芳——王效贤访谈录》，曾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时任中国日本友好协会副会长的王描述邓见大平的细节：“两位老朋友重逢，都十分高兴，非常亲热，紧握的手迟迟不肯松开。”“大平听后，眯着眼睛问小平同志：‘你们搞现代化的远景是什么？’/小平同志沉思片刻，想了一想说：[略]”经本人审阅同意的该文（特约记者董振瑞、益蕾）作为当场见证无疑最具有权威性（其中引邓说的“我想把这种状态叫‘小康’”，也比何文的“我把这个叫小康”权威），而“紧握的手迟迟不肯松开”、“眯着眼睛”、“沉思片刻，想了一想说”这三个可信的细节朴实无华，对比何文之看似惟妙惟肖的花哨就愈觉老子《道德经》第81章所云“美言不信，信言不美”精辟。这八字真言的本意即是真实的话因未经加工而不美妙动听，辞藻华丽的言辞、文章则由于添了“味精”（谐“未经”音的谑语）而往往非原味、不真实。不妨由此衍生出指话语的实质内容、遣词格调等方面的另类“美言不信，信言不美”，如“战无不胜”、“万寿无疆”等赞美常胜、祝福长生之类的颂词中看、中听而如窗纸一捅就破（毛泽东就曾说：“自古以来，常胜将军是没有的，打两个胜仗一个败仗，就是优秀的军事指挥员。”²⁷“哪有人能活一万岁的？”²⁸“我姓毛，工作是党的主席，叫我毛主席，我听了很舒服。什么四个伟大，讨厌！”²⁹），“黄猫、黑猫，只要能捉住老鼠的就是好猫”这样其貌不扬的俗语、丑话倒含赤裸裸的真实。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管、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主办的《百年潮》月刊2008年第八期载曹普《“小康”构想与1983年邓小平苏杭之行》，称大平访华期间向邓问中国将来会是什么样和现代化的蓝图是如何构思的，事先没料到的邓思考了约一分钟后给出答案，提出了影响中国未来几十年命运的重要设想。对超出预想的提问略加思考后开腔似乎不如胸有成竹地对答如流那样形象“高大全”，然而上述三文一致的没有当即作答正因无修饰（何文的缓缓点烟云云除外）而显得可信。

“约一分钟”如确凿则比“片刻”更富于“样·详”的形旁相同所象征的“高清”史料价值，但“详·佯”亦右同为“羊”又提示“史不厌精”（谐“食不厌精”音的谑语）会过犹不及，回忆录、传记、纪实文学越求栩栩如生的“翔实·详实”就不免越要被记忆或主观的偏差弄得走样。周恩来办公室机要员邓东来上任时因不习惯其苏北普通话口音而把他说的“三原则”听成“三原之”，³⁰在此可借这一耳听之虚的谐音“散原汁”来表述再现历史、发掘真相时的一大“魔障”——原始材料往往落得残缺、流失、毁损或遭到增删、涂抹甚至篡改而无从领略其原貌、原味，留神细节的必要也在于这4字对应的“神灵（魔鬼）寓于细节”所决定的不详则偏离原样。《道德经》

最终章节的首句“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之后还有“知者不博，博者不知”的高见，其原意一般理解为知“道”（原理；奥秘）者未必博闻多识，而博闻多识者未必知“道”，评李晓航文的“知情者”自称“没有什么水平”、“语无伦次”的头是道就可算非博之知，而《我的天堂》中的上述疏忽却要归咎于大手笔的求“道”时博闻多识的“厚勤”没能跟上（此“厚”由“博闻多识”联系苏轼《杂说送张琥》云“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厚勤”谐“后勤”音而既指台后、幕后的辛勤积累，又挂连上述邱会作任首长的解放军三大〔1998年成立总装备部后为四大〕总部之一，而后勤保障在战争中近乎生命线的重要性见于志愿军首任司令员彭德怀的感言，他在入朝参战一周年的1951年10月25日被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授予一级国旗勋章后说：第一应授予“高麻子”〔时任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行政区主席的高岗〕，第二该给“洪麻子”〔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后方勤务司令部司令员洪学智〕，因为如果没有他们昼夜设法支援粮弹物资，志愿军就打不了胜仗）。³¹⁾

曹文称邓说的“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是他首次用“小康”这个新名词来描述未来20年的发展前景和用“小康”代替“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何建明也写“‘小康’从那个时候起，就成为了中国现代化总设计师梦中的一幅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蓝图”，而里程碑式的“那个时候”未标明日期似乎是对具体时间带过不提的“泼墨大写意”特色。何建明博客发布的上述新版本中会见时间改初版的“次年10月”为“次年”，本文作者在《从称谓“魔杖”管窥中国政要心迹及中国社会规则——〈晚年周恩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毛家湾纪实〉、〈国家的囚徒〉、〈大红灯笼高高挂〉等禁域·深宫话语联析〔上〕》〔本刊第22卷第2号，2009年10月〕的注14中，对《我的天堂》初版除了王效贤性别搞错问题外还指出：“邓出此语当为大平访华的12月6日，文中作10月邓访日时是和上年混淆，而当时大平尚是自民党干事长。《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中，就载有这场谈话节录的《中国本世纪的目标是实现小康〔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六日〕》〔237—238页〕，但‘可以吃饱穿暖，我把这个叫小康’被割爱。”《邓小平在苏州首提“小康”概念》这一标题如单看则可以有两种解释，即在苏州首次提到其前已提出的“小康”概念和在苏州首次提出“小康”概念，故乡就是这座古城的作者在“苏南三部曲”之一的该作品中或许是有意为当地出彩，而视察苏州的时期和模棱两可的上述言词同样模糊地为“新一年的春天”的“那一天”。

接着会见大平的场面是“时间过去两年多”后邓在十二大上讲话：“同志们，这次代表大会将是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一次最重要的会议。这次代表大会要审议和确定党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而奋斗的纲领……在这年9月初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一再这样强调。”（原文无引号；省略号为原文，本段下同。）查核当月1—11日于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大会上邓致的开幕词即可发现，“同志们”仅有开头的“同志们：/中国共

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幕。”《我的天堂》中紧接于用逗号隔开的该称谓之后的打句号的长句原本在其后第三段（仅一句）：“回顾党的历史，这次代表大会将是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一次最重要的会议。”再下一句对照原文中上述宣布开幕后的第一段的相应部分——“我们这次代表大会的主要议程有三项：（一）审议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的报告，确定党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而奋斗的纲领；[略]”，又会对不露痕迹地颠倒次序及把审议报告、确定纲领合并成审议和确定纲领稍觉别扭，毕竟**历史文献即便是概略引述也不宜为“红装”（“红色”包装或抹口红般地装点）而不按原状（借化毛泽东《七绝·为女民兵题照》[1961年2月]诗句“不爱红装爱武装”的谚语）**，会上一再强调云云也让人不知是何时间、场合、方式及以上内容有无由他一再强调的必要。有关十二大的叙述之后的段落作“新一年的春天到来了。春风首先吹绿了江南大地”，不著一字而求“风流”地点出了时间是1978年的次年的两年多后的十二大的次年春。“‘我想到江南走一走。’ / ‘太好了，’老爷子（家人和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这样尊称邓小平——笔者[即何建明]注）、想到哪儿去？去苏州怎么样？ / ‘去江南不去苏州去哪儿？’ ‘老爷子’话不多，但一旦说出来，就是掷地有声。”然后就镜头一转从京城家中（文中未明写）筹划远行的光景跳到了兴师动众漫游江南的亮点：“苏州美，最美在太湖。[略] / 那天，邓小平在江苏省委书记韩培信和女省长顾秀莲等省领导的陪同下，乘坐一条游船，缓缓地驶向太阳初升的太湖……”

这组蒙太奇给人的印象是邓在这天入春后提出下江南并于其后成行而径到苏州，《现代汉语词典》的“春季”定义为“一年的第一季，我国习惯指立春到立夏的三个月时间，也指农历正、二、三三个月”，因而当晚于1983年的立春（公历2月4日）或春节（13日）。曹普记述邓为实地考察“小康”目标的可行性而于2月5日乘专列离京、6日抵苏州，次日约见陪同考察的江苏省负责人江渭清、顾秀莲以及苏州地委、市委的负责人等听取汇报。好在《我的天堂》并未明写邓是春天到来后才想起去江南的，否则就成了立春才说、次日即走这样的恐怕**心血来潮的毛泽东才会有的“老夫忽发少年狂”**。从上述节录十二大开幕词中被舍弃的“回顾党的历史”的视角就可以看到毛不乏类似举动，如67年7月13日下午他召集林彪、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成员和萧华、杨成武开会，为亲临较乱的中南地区去做军队的思想工作、扭转混乱局面而提出要
到湖北、湖南去，对大多数与会者以武汉武斗严重、安全无保障为由的反对不以为然，当场命汪东兴准备专列火车并指定杨成武随行、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郑维山同车前往（以便旅途中跟他谈毛认为“干部将来要来个大翻案”的河北问题），在周当晚飞往武汉安排住处、检查安全之后于次日凌晨三时出发、当晚九时抵达武汉。³²⁾ 上年7月18日回京以来的首次巡视外地在第七天上就闹出他一时陷困局、慌忙离危地的大乱，**落得飞蛾扑灯也暴露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虎气”（毛自称性格的主要方面）之偏向**。72年1月10日在陈毅追悼会即将开始前突然决定要

去而风风火火地吩咐调车，不顾身边工作人员的换衣添装建议而在睡衣、薄毛裤外只穿件上衣、披上大衣就径直走去，生活秘书张玉凤追忆后来果然导致风寒摧身的这番倔强时感慨毛一不二的脾气叫人无奈：“有时候他要做的事情谁都别想阻拦，他不想做的事你动员他做也不那么容易。”³³⁾ 邓的上述江南行若真是入春后说走就走则颇能反映和已故领袖相似的雷厉风行及绝大权势，未出现在能从邓家人处获取信息的作者笔下大概因为正常人在太平时期不会出此非常举动。

综合曹普、何建明的记述就可知邓游太湖是在离开苏州的前一天即2月8日，《我的天堂》写“坐在他身边的是江苏省的年轻女省长顾秀莲”就人而言应当不错，因为媒体公布过她坐在一手拿茶杯、一手比划着讲“小康”目标的邓身边做笔记的照片，作者也称“许多年后，我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采访已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她”。顾出任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2003年正是邓“访苏（江苏；苏州）”20年后，“许多年后”而非具体年份或“20多年后”的写法再次贯穿了似乎不屑精确表述时间的作风。以挖掘党史秘闻、展现旧事细节见长的纪实文学作家叶永烈则截然相迥地多标明访谈日期，这想来既要归结于他对自然科学造诣深厚并从事该领域知识的启蒙任务而具备的严谨精神（青少年科技普及读物《十万个为什么》丛书1961年由[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推出以来，他是到2013年起陆续问世的第六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的各版均参与编写的传奇性作者，最新版中承担了《化学》分卷的约四分之一的答题量），³⁴⁾也是中共党史及中国现、当代史之扑朔迷离、众说纷纭而非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不可之故。“年轻女省长”在使人遗憾未能写王效贤为“女翻译”的同时又提示了政界的“年轻”标准，顾的时年46岁（1936年12月生）小于十四届一中全会闭幕时胡锦涛的差67天满50岁，被认作年轻女政要或误译为“young women”的二者年龄都说明不到半百都可归“轻”级，不知是由于资深元老当道的传统根深蒂固还是出于共和国朝野相信“革命人永远是年轻”（2009年中宣部等九个单位推荐的100首革命歌曲之一，歌颂东北抗日联军英雄的歌剧《星星之火》[东北鲁迅艺术学院戏剧部实验剧团1950年首演]唱段，劫夫作词、曲）。可惜作者又忽视了当时由省委书记韩培信代理的省长职位是两个月后才移交副书记顾秀莲的，江苏党、政领导班子恰于邓离去后的3、4月换届是值得同情笔误的因素。

韩当天同乘游船如是顾所提供或确认的就属确证，曹文以“文革”之初便在省委第一书记任上被打倒的江渭清为陪同考察的省负责人之首，看似“蒙——太奇！”（借“蒙太奇”字面的谜语，指令人发蒙、着实离奇）的老皇历，因为江复出后于1974年12月任江西省党、政一把手（分别至82年8月、79年12月），82年在十二大诞生中央顾问委员会时被选为委员而淡出了政坛现役。但党史研究权威机构、学会主管、主办的刊物之“信史、实学、新知、美文”宗旨并无失“信”，因为苏州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在《伟人嘱托激励伟大苏州实践——写在邓小平同志视察苏州30周年之际》（该室主办的“苏州党史网”2013年2月6日发布）中，用了说明为“1983年

2月8日,邓小平考察太湖时听取江渭清、顾秀莲工作汇报”的照片。江上年返“老巢”南京(老家则为湖南平江县)后以“长老”身份坐在邓和顾中间的位置,和江泽民卸任总书记、军委主席(2002、04年后)后仍就座十八大(12年11月8—14日)主席台前排正中成叠影,而何文不提江渭清和苏州市委党史办文不提韩培信又使人不知是何缘故。

韩3月才升为一把手的省委的其时负责人在《我的天堂》里也不见扬名,而在时任苏州地委书记的戴心思的访谈中有闪烁其词的“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戴心思,原苏州地委书记,40年参加革命工作的南下老同志。现年83岁的戴老在医院接受我的采访,在谈起1983年春天邓小平来到苏州的情形时,依然带着几分压抑不住的激动。”27年2月生于山东蓬莱的戴在该书刊行时虚岁才是83,此文如理解为未写明时间的采访是在同年出书前的不久,则可知《邓小平在苏州首提“小康”概念》缺陷不少的主、客观兼有的原因也在于急就而成。原地委书记之“原”可解释为采访时早已卸任、不排除是邓去时担任的意思,而地方委员会书记是否为此篇中重要的83年2月所任职务则无以“时任”加以标出。曹文亦提到的地委在上月18日撤销苏州地区及地、市合并为苏州市后过渡性存在也应不久,有文献表明最后一任地委书记戴在3月1日开始市管县体制前2月已转任首任市委书记。³⁵⁾不过戴又说“小平来之前,省委书记就打电话给我,让我准备苏州地区的情况汇报”,从“当时我们苏州有八个县,除了现在所管辖的几个县市外,还有江阴、无锡两县”来看,只有作江阴、无锡划归无锡市的1月18日之前的事才讲得通,由此可推断邓在此之前(而非入春后)就向省委负责人下达了视察江苏的意向。

《1976年10月6日:中国政治大地震》中提到关于“四人帮”倒台的历史的描写中,大多有叶剑英与李先念在9月间数次频繁而秘密会面的细节,但王守江、马锡金谨慎地表示他们能确切回忆的叶、李会面是4月;王说“如那些正史与野史之描述,两人见面后的确有过这样一番对话——/叶剑英问:‘什么风把你吹过来了?’/李先念答:‘无事不登三宝殿’。”叶或许是出于谨慎而本想在院子里接待,后来可能担心失礼而请进屋里的小会客厅,10分钟后李便告辞,交谈内容王、马等人并不知晓;马又否定了外面传说的写了小纸条又烧了的细节,因为清楚地记得自己回来收拾时烟灰缸是干净的。对正史及野史的部分证实(由此可联想正史应以同音的“证实”为基础)和对传闻的否定,可谓“龙蛇影外,风雨声中”的超脱利害的知情者检验、甄别历史真相、细节的典型事例,《我的天堂》里的“戴老书记”的陈述(在此兼用“陈”的形容词意指讲故事)亦相当谨慎:“小平同志一生到苏州有据可查的有两次,一次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另一次就是改革开放进入特殊阶段的1983年春天。”戴在2008年发表的其它访谈中具体披露邓的两次视察是59年2月初、83年2月6—9日,³⁶⁾以有据可查为准的严密界定也形成对所谓邓言“去江南不去苏州去哪儿”的疑问,熟悉共和国史者知道政治局常委级的政要以苏州为在江南疗养的首选或主选者是陈云和林彪,陈对苏州评弹的酷爱可算毛泽东时代借“政治病”把此地当避风港的文化背

景之一，69年10月至翌年4月在此“战备疏散”的林之“行宫”又正是邓这次下榻的南园宾馆，而和毛以杭州为第二故乡所不同的邓之江南情结多现于晚年常避开北京的酷寒到上海过春节。恐怕是超越戴之谨慎的《我的天堂》作者的费心思还表现于下述回顾中的语焉不详之处：“小平同志来了以后，就对省委书记说，他要了解苏州地区的农村情况，他的工作人员告诉省委书记说要听20分钟的汇报。于是省委书记就将我准备的农村情况材料向小平汇报。后来汇报时间过了20分钟，小平说：你还有什么还可以说嘛！这样省委书记又汇报了我们的苏州地区学习落实党的十二大提出的翻两番的事。”

戴口口声声说起的“省委书记”会使党史知识少的读者以为是上文提及的省委书记韩培信，因为1980年代初各一级行政区党委换届时第一书记职位取消后书记仅一人的格局成为常识，而83年3月升任省委一把手（同称省委书记）的韩其前是第一书记之下的数名书记之一。戴心思访谈中对邓的称呼和顾秀莲一样是显得随意、自然的“小平”和“小平同志”混用，因而对上两个情节中的五处“省委书记”不直呼其名或以“××同志”相称就更感觉奇怪。尤其令人诧异的以职称隐名的绕弯子见于戴谈起当地的发展对外省产生冲击性影响的一段：“那次邓小平同志听了苏州人对‘翻两番’表示没问题后，似乎兴致分外浓，便不时地问苏州人：‘你们靠什么呢？’/苏州人：‘我们靠一些小企业。’/‘我们当时都不敢说社办企业，因为文革遗毒还在，社会上对我们苏州地区搞乡镇企业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尾巴。’戴老书记回忆说。/[略]/‘办社队企业积累起来的钱，能够办化肥厂、农具厂。那个时候我们全苏州办了不少这样的厂子，非常有力地支援了农业生产。’戴说。/邓小平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好事嘛！’/‘我们那时有个口号，叫做‘为了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为农业。办社队企业后，不仅农民获得了多一层的收入，而且农业产粮不仅没减少，反而增加了。平常一般年份，我们全苏州上缴粮食在18亿—20亿斤，那些年我们最高时达到了24亿斤。后来成了中央领导的当时的四川省委书记来我们苏州参观，我陪他参观我们的一个农具厂，他看后很震惊，说：这就是社队办的农具厂？我说是。这个省委书记回去后，包了一架飞机，将全省的县委书记都拉到我们苏州来参观社队企业。’”戴老对那段辉煌历史记忆犹新。”最后这句记述及其上的“戴说”应当理解为和“戴老书记回忆说”同为访谈而非当时戴对邓说（戴在上年的上述访谈中称“我没有向小平同志当面汇报过苏州地区当时的社会与经济发展情况”，³⁷）何文提到邓与戴的对话仅有游虎丘时问他人均800美元是不是小康了，戴不了解800美元是多少、“小康”是什么概念而脸红，当得知就是指当地农村的中等水平时如释重负地回答应该没有问题，而上述文中应对邓询问的“苏州人”就不知是任何职和何人），但用引号标出的“后来成了中央领导的当时的四川省委书记”如有录音证明是原话就更费解。

熟悉邓小平时代的社会演进及若干年以来的言论管制者一看便知所指的此公乃赵紫阳，他在1975年10月—80年3月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其间至79年12月还兼省长）后，于80年4月、

9月分别就任副总理、总理，党内职务更是从79年9月“入局”、翌年2月“入常”、再下年6月升副主席（至82年9月废除主席、副主席职位）、87年1月代理总书记、同年10月“转正”（至89年6月“下岗”）。对邓领导中国从国困民穷的惨境走上谋求富强的康庄大道的那段辉煌历史记忆犹新者（“国困民穷”这一创语基于《“五七一工程”纪要》的“用民富国强代替他‘国富’民穷”，林彪之子林立果的私党小集团1971年3月22—24日草拟的这份政变设想提纲中，“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等现状分析即是对“国富”所加引号表示虚假的诠释；本文用“困”也挂连以下阐述的“道德困局”。“康庄大道”本是由宽阔平坦的大路比喻美好光明的前途，在此文脉中还以“康庄”字面对应“小康”、“农庄”这两个关键词），应不会忘记扭转“农民生活缺吃少穿”（《“五七一工程”纪要》语）局面的全国领军人物及佳话：“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在中国人民群众中曾广泛流传着两句话，那就是‘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粉碎‘四人帮’以后，他们两个人一个在安徽当省委第一书记，一个在四川当省委第一书记。他们带头打破左的禁锢，打响农村改革第一炮，勇敢探索农村改革之路，大胆支持农民的改革之举，实行包产到组、包产到户，让农民重新获得生产自主权，粮食增产，很快吃饱肚子。”[北京]《炎黄春秋》月刊2008年第一期载田纪云《经济改革是怎样搞起来的》一文接着称：“农民对他们赞誉，实质上是对党中央改革开放路线的歌颂。”1985年9月—97年9月任政治局委员、83年3月起任副总理达10年的作者加此说明，好像也有不归功于党中央、不亮出改革开放的旗号则难于为被封杀18年半的故人张目之苦衷。

以上文字开头的第二部分《农村改革打头炮》专写万老功绩而赵紫阳连全名都未出现，这或许是第一部分《改革开放的条件准备》聚焦在赵之前遭废黜的总书记胡耀邦之无畏奋斗，第四部分《全面展开经济体制改革》则特书赵在总理任上的贡献这一谋篇布局的需要所致，第二部分最后点到的“1989年那场风波”无疑是阻碍赵的事迹甚至名字重见天日的根本症结。第三部分《城市经济改革部分尝试》写在1978、79年之交任四川省财政局长时也没有言及赵，但“风暴·波乱”（组合“风波”、“暴乱”之语）后媒体除病逝报道外首次亮相赵的名、事，就是该刊2007年第七期载田文《我在国务院大院的回忆》文中大加称颂其身体力行倡导节俭，以改革派干将著称的田在同年第12期发表的《近距离感受邓小平》中也多次正面搬出赵来。这位前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93—2003年在任）三次高调挺赵无疑会触动部分人的神经，如“在位期间，从未对自己的住宅、办公室大兴土木购置贵重高档用品”就是反衬权贵腐化，敏感记述还有1986年6月10日随赵汇报经济形势时邓指示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日程上来等。“事不过三”的忍耐终于在2008年九月号登《文革后期我与四川省委书记的交往》后破限，新华社四川分社前社长孙振以亲历再现赵当年深入基层调查、调整农村政策的扎实、务实，以“改革难，要想在乱时谋改革更难”起首的该文对赵的“临危受命，心系民生”赞不绝口，三次提到“要吃粮找紫阳”这一盛传全国的

民谣并动情地称“是人民对紫阳的最为美好的赞誉！”赵被打翻在地后大陆媒体首篇专文正面报导据称刺激了不在位却谋政者对杂志社的行政干预，以致眼下还可见有民间博客转载该文时或是怕沾上“围巾违禁”而用字母代其名作“赵ZY”（“围巾违禁”这一原创谐音谑语的“围巾”由“微博”的谐音俗称“围脖”而来），啼笑皆非的“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ZY”使“找紫阳”和“赵紫阳”的谐音荡然无存。

孙文标题中的“四川省委书记”恐怕也是出于顾虑而既不写名又不用“第一书记”之称，省略“第一”的这一用法又可为戴心思所说的改革开放初期的“四川省委书记”即赵的旁证。戴往昔对邓汇报时因“文革”遗毒作祟而不敢说有舆论指作“资本主义的尾巴”的社办企业，而在时年已同毛泽东、金日成的未达到“万寿无疆”的享年、离休多年之际则当全无忌讳。孙写赵为解决城乡人民的温饱“冒着被打成反革命的政治风险，运用巧妙迂回的方法”努力，用巧妙迂回的“ZY”来回避的政治风险毕竟只是受屏蔽的小麻烦而无被打成“反革命”之虞。田纪云在将任满两届副总理时称其间最基本的体会是中国必须坚持改革开放，以及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又自豪地说自己具有维护实事求是原则的勇气，不怕碰硬，不怕丢官，“毛主席说‘五不怕’，我看有一不怕就行，不怕丢官就行。”何建明把“去江南不去苏州去哪儿”这样的邓小平之言形容为“一旦说出来，就是掷地有声”，而和毋宁是“一锤定音”较恰当的此语相比更符合“掷地有声”的这番话有可谓一针见血。无官一身轻的戴不可能心思重到连早有田纪云显彰的赵紫阳之名都不对采访者直说的程度，按常理推测只可能是作者或编辑等加工者不愿“越界”而把原话中应有的姓名加以模糊化。《我的天堂》中“这个省委书记”的另一称谓“他”只能表明是男性而信息量几乎为零，因为此前一级行政区党委一把手仅1985年6月—88年4月任江西省委书记的万绍芬一人。在此层面上的“巾帼不敌须眉”的传统直到2009年孙春兰任福建省委书记才再次被突破，财经网2012年11月21日发布的《【人物素描】新任天津市委书记孙春兰》（记者陈宝成）中，称首位由省委书记跻身政治局委员的孙刚与另一女性高官刘延东一道当选政治局委员，“从而创下了两位女性同时当选政治局委员的纪录”，其实这一纪录早已开创于九届一中全会（1969年4月28日）上的江青、叶群双双“入局”，因而充其量是平这一纪录或创本世纪首例。然而也难责怪对往事未加注意甚至根本不知的撰稿者、审稿者对党史了解不够，竭力淡化甚至抹消“文革”记忆的势力、倾向占上风、居主流的环境也会制造出“盲区”。

不妨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衍生几个借谐音的相关命题——“时间是求证历史细节的天然障碍”；“失检是诱发低级错误的人为因素”；“事件是导致屏蔽真相的社会变故”。在回忆、再现历史时常见的种种“颠”（颠倒）、“扑”（扑空）、“不”（不当）、“破”（破绽），首先可以想到或许是时隔久远或记忆趋淡而难免出现的偏差、失真乃至空白，年过八旬的戴翁能于健在并且头脑清晰的状态下如数家珍地详述邓巡视苏州时的情景、对话，能算是《我

的天堂》作者将四分之一世纪前的这段完整故事在亲历者故世前“抢救”出来的成果。《邓小平在苏州首提“小康”概念》中有关场所、引文、性别、职务等的错误无非因失检，《现代汉语词典》的释文“**动**失于检点：行动～”容易引人联想“失检”即生活作风不检点，这当然也有官场、商界等的政治、经济丑闻往往和情色艳闻缠绕链接的社会现状不无关系，该词典的“包”字条目的第13个义项（“**动**包养”）示例就举这一高频词作“～二奶”，“二奶”以专条（释义“〈方〉**名**有配偶的男人暗地里非法包养的女人”）登堂入室占一席之地，世间用“包二奶”戏称胸罩、拿“中央一套”来调侃避孕套的轻薄风气实为人心不古的凶兆，而“检点”又有“**动**①查看符合与否；查点。②注意约束（自己的言语行为）”的双义。工作上、创作中查点当否有失的出错和生活中、道德上有失自我约束的违规都会造成恶果，而赵紫阳在何建明笔下落得有职无名和2005年1月17日逝世后仅56字的官方消息不提职务（“赵紫阳同志长期患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系统的多种疾病，多次住院治疗，近日病情恶化，经抢救无效，于1月17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5岁。”），又显示出历史探访的误区中以事件和风波、秘密和禁忌织成的“雷区”最为棘手、尤难跨越。田纪云的“不怕丢官就行”论之切中要害可由赵遭罢官后被“毁尽文章抹尽名”得以证实，郑板桥《沁园春·恨》词中此句可表现的断其前程、败其名声也见于另一被隐名的省委书记。

《“五七一工程”纪要》所谓“用民富国强代替他‘国富’民穷”中的“他”指毛泽东，文中用“当代的秦始皇”或“B-52”（美军远程战略轰炸机）代称毛是出于保密而不敢明写。记述戴心思回忆中“后来成了中央领导的当时的四川省委书记”仅作不成为线索的“他”，似乎是作者或出版社等有关部门慑于重重束缚“不敢说，不敢说，非常不敢说”（五代“十朝元老”冯道[字可道]的门客在他家读《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时忌于师讳之言）。这个“他”又能联系《文革后期我与四川省委书记的交往》中的毛对赵引古人解汉字的趣谈（本段引用为了展示当下网络空间中司空见惯的“不敢说，不敢说，非常不敢说”的滑稽效果，特用一些博客的转载而非《炎黄春秋》网站的“往期回顾”栏内可阅览的无遮掩的原文）：“我原本不认识ZY同志，几年以前，我任新华社江苏分社社长时，在一次江苏省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最初听到赵ZY这个名字。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同志可能是初次见到赵ZY同志，把赵ZY看做是一个年轻有为的干部，也可能是在国民经济困难时期，为了活跃会议的气氛，饶有兴趣地问起赵ZY的出生地。赵ZY回答说是河南滑县人。毛泽东同志当场兴致勃勃地说：‘滑者水之骨也。’”此语源于王安石撰《字说》释“波”为“水之皮”而被苏轼讥讽“滑”莫非是“水之骨”，使王闻后自愧毁书的“滑者，水之骨也”倒也不妨形容水有以柔克刚、驰骋至坚的风骨，而“波”和苏东坡之“坡”、“陂”、“跛”、“簸”、“皱”这些带“皮”的字都含不平之意又值得玩味，这一逸闻又像是暗示赵紫阳命中注定要在风波中显露风骨。由此“歪推”则可从上述人称代词的字形组合提出“他者，人也”之说，戴心思口述记录中的“省委书记”连“他”都没有而更少人性化味道。

当然即使不用此称谓也能从顾秀莲的职务前加“女”而知这人必是男性，而重要的是对邓汇报超过 20 分钟的此公是哪个书记或惟一的第一书记。

本无党章依据的地方党委第一、第二、常务书记的职称十二大后随着强调民主集中制而淡出，一级行政区中始于 1982 年 12 月四川省委换届时前第一书记谭启龙（赵紫阳的后任）卸任，原排第二书记鲁大东后的常务书记杨汝岱（87 年 10 月当选第 13 届政治局委员）出任书记（一把手，下有三名副书记）。³⁸⁾ 邓小平到苏州时尚未换届的江苏绝无第一书记不恭候、接驾、陪同之理，其证明就是邓在十三届五中全会（89 年 11 月 6—9 日）同意辞去军委主席的“全退”两年多后“南巡”时，虽然行前未向沿途各省打招呼、不想惊动地方负责人迎送，92 年 1 月 18 日专列在第一位武昌、第二站长沙分别停车 29 分钟、约 10 分钟之际，湖北、湖南的省委书记都率一班党政大员向这位“无冕之王”汇报情况、聆听指示；次日抵达预定逗留休假的深圳时也是省委书记谢非（同年 10 月当选第十四届政治局委员）牵头出迎。83 年 3 月江苏省委换届前的第一书记是 77 年 2 月就任（其间至 79 年 12 月兼省长）的许家屯，由此政坛常识按图索骥去搜寻《许家屯香港回忆录》〔台北〕经联出版事业公司，1993 年），果然印证了他就是戴心思说的向邓汇报超出预定时间、重点提“翻两番”的那位书记。许回顾说中央领导来时尽管是休息，地方官也要汇报、请示，但邓小平办公室主任王瑞林先是“挡驾”，随后通知“老人家”同意谈，要求不超过 20 分钟；自己是首次与邓单独谈话而有些紧张，但汇报一开始就发现邓对自己的话题很有兴趣，约定时间过后王在门口转了两趟，见两人谈兴正浓就走开了；等王进来催吃晚饭时自己起身告辞，邓站起来握手道别，出来后看表才知道竟然两个多小时过去了。和戴讲述的不同是先围绕江苏能否提前达到“小康”水平的争论阐述自己认为可行的根据，超时继续后才介绍发展社、队企业等本省（典型为苏州地区无锡县）农村情况，许的说法更可靠除了一对一的亲历外也因前一个话题事关和省几个反对自己的老人的分歧，由此还能看出人在行事、叙述时往往自然地以自身的利害、关心为基轴。

有心人记录了 1992 年邓小平南行专列在武昌火车站从上午 10 点 31 分停至 11 点零 2 分，离去后省委书记关广富、省长郭树言、省委副书记兼武汉市委书记钱运录当即凭记忆将邓的谈话记下，由钱笔录后当夜由省委传至中办。³⁹⁾ 许称邓听汇报不需人记录而室内无第三者，而受邓嘉许等一系列记述之可信还因为他由此受赏识和重用是难以怀疑或显而易见的事实。许称一个月后胡耀邦电召去京当面告知邓在常委会上表扬许说江苏搞得不错，常委都同意邓让许再“过渡”（超过退休年龄的老干部为中青年干部接班“搭桥”而留任）一段的意见；不料在省内一直作对的几个老人因工作上的是非之争和自己按规定先后退下而坚决反对，反弹强、能量大的活动使两年前中常委无奈将江苏班子调整的确定方案推倒重来之事重演（值得注意的是所写的纠葛要因之一是对立面“在党内资格比我老，认为我对他们不尊重”，又点出中央做工作也无效的僵局和上次令

中常委收回將成命的決定都是因他們得到陳雲支持，這一記述如屬實則足可見在論資排輩傳統之下元老干政而致人事妥協的結局早有不正一例)；83年4月胡耀邦把許從京西賓館召到中南海勤政殿，通知他中央決定派去香港任中共港澳工作委員會書記、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說明是中央為收回香港並實行“一個中國，兩種制度”試驗而需要魄力的，自己提名並得到常委一致贊成及鄧同意的這一入選是考慮到許搞經濟有經驗、有創造性；被任命為駐港“總管”的許在深感信任、重用的同時又因搞外交屬門外漢和時年67歲而感困難，但在總書記的動員下“想起參加共產黨的初衷，就是為了挽救中華民族的深重災難”，“再者，服從命令聽指揮，是共產黨的鐵則，也是我多年養成的黨性，從未討價還價。而離開江蘇時的某些不愉快之事，又使我憋了一口氣，可以去開創一個新的天地。我下決心接受新的挑戰，說道：‘感謝中央的信任，我去！’”

許稱當時自覺老來還要重新打鼓另開張的難度不可謂不大，但還未意識到由共產黨人去維護香港資本主義制度至少50年不變並保證繼續繁榮這一特殊使命的複雜性和困難性，而這兩點和當年王瑞林在蘇州“擋駕”時所說“老人家來休息的，免了罷”中的“老人·罷·免·休息”，竟應到了在港任職六年後卷入政治旋渦而丟官、74歲上為躲避整肅而赴美“旅遊休息”的結局。許記述1989年12月25日江澤民總書記對港澳工委一班負責人宣布中央決定他退休、調回，和李鵬（政治局常委、總理）對他們提的交接建議加以否定，“宣布一個高級干部的調免，召開這樣的會議，採取這一形式，領導人持這種態度，在共產黨內很不正常”，然而平生調動工作從未見過的如此“盛大”陣勢又由於他的一些舉措、態度埋下了天大禍根。李鵬下令北京戒嚴的次日新華社副社長張浚生來告《文匯報》同仁要以社論“開天窗”來反應，許因同情學生運動和知道阻擋不住而示意贊成他採取這種後果恐怕很嚴重的處理方式，於是下一天（5月21日）頭版社論欄登出張擬用的“痛心疾首！”四個大字（報社內多數人主張用“夫復何言”），被視為中共在港“喉舌”的這聲怒吼引發的強烈震動不可避免地導致北京方面的秋後算賬。許稱次年1月15日公布由周南接任時人大常委會對這一任、免事宜連形式上的討論都沒有，對“連表面文章都不顧及”的迫不及待地調回內地的緊張又因梁湘被撤除黨內外一切職務而升級，81年起歷任深圳市委書記兼市長、首屆海南省長的開辟特區功臣89年9月遭用“以權謀私”罪名清算，引為前車之鑒而不願束手待擒的許遂以“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之理痛苦地選擇了“下策”，於90年5月1日在英、美當局的默契配合下從香港乘美國班機飛往舊金山。中央在通過駐美大使等渠道以保證沒事說服歸國而屢碰釘子的情況下，於翌年3月2日、3日宣布對其撤銷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顧委委員職務並開除黨籍。

許反復思考並作決斷的4月25日是把學潮打成“動亂”的《人民日報》社論發表一周年前夜，聯繫再上年的4月26日海南省政府掛牌則隔年日期連環上的一天之差有避開了“梁湘第二”劫難的意味。30日晚離深圳去香港後兩小時市委副書記秦文俊就到其住地轉達中央命赴京的通知，

秦接到电令时因须出席“五一”联欢会而只好完后赶来，许庆幸运气好说这个时间差救了自己。19年前的“五一”节晚一脸沮丧地勉强上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的林彪始终不同毛泽东说话，几分钟后便从毛对面的座位上不辞而别的异常举动表露出批陈（伯达）整风中受压的怀恨。新华社1971年5月1日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同首都五十万革命群众和国际友人欢度“五一”》称：“晚八时，乐队高奏《东方红》。伟大的导师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次日《人民日报》刊载时还配上毛、林在夜色中由周恩来跟随“健步”登上城楼的照片，但历任毛、周的专职摄影记者的杜修贤却回忆毛、林、周鱼贯而出是上午的事，晚上则是毛等人在圆桌上就座、周派秘书打听下落后林才慢条斯理地走进大家焦急的视线里，夜幕降临后拍下的毛、林同在的照片仅《人民日报》亦登的对坐圆桌而彼此不看的一张，⁴⁰由此可知那时就有官方媒体为着维护高层领导“团结”的虚假形象而不惜伪造事实的不正之风，而“伪·造”字形组合的“人为·告走”也见于90年“五一”前夜及当天的许家屯离境“去国”。

许在回忆录中写上述首次直接接触邓前就感觉他水平高、原则性强、一丝不苟，举例称粉碎“四人帮”后在北京一次全国性的农业生产会议结束时，党中央主席华国锋首先离座步下主席台，这时也站起身的邓和李先念相互谦让，都不肯走在第二位，当时邓第三次复出（按：似应为第二次被打倒后第二次复出），排名在李之后，看来李尊重邓党内的资历而让他先走，双方谦让了一会，邓很严肃地对李说：“按原则，你应先走。”李很尴尬地只好先离开。这件事加深了和其他几个省委书记一起坐在台上的许对邓一丝不苟的印象，相形之下“副帅”无视政坛规矩的越轨行径成为与领袖公然分道扬镳的拐点丝毫不奇怪。不再在“阳关道”紧跟的林破罐破摔地欲飞渡“独木桥”而成为建政以来出走国外的顶级政要，历任“封疆大吏”和中央委员（1977—87）等的许则是成功逃到海外的最高级别官员。许行前写给邓、杨尚昆（时任国家主席、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及中央的信中申述：因北京风波被迫“去国”是暂时的，对外将宣称是“旅游休息”；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共仍具信念，对邓仍尊敬、拥戴，只是对中常委中有些人不能信任；保证不寻求政治庇护、不泄漏国家机密、不公开发表文章和讲话、不接触“民运”人士；企求某些中常委勿株连家属，不要逼自己再作不愿的选择。“文革”初期在省级干部纷纷被打倒的造反狂潮中毛泽东曾发话“江渭清、许家屯我都要保”（与本文宏旨无关的此语以黑体字标出除了强调毛曾对他和江渭清一道看重，更是旨在再现“文革”时期出版物中“最高指示”须一一以此表示突出的规则），曹普《“小康”构想与1983年邓小平苏杭之行》中混为一谈的这两人所受待遇可谓特殊，而难逃非议为“叛逃”的远走高飞就不能不落得连天王老子也保不了。

许的后任在《周南口述：遥想当年羽扇纶巾》（宗道一等编著，齐鲁出版社，2007年）中，数落许到港后降服于物质诱惑、亏公肥私、搞政治投机（如“89风波”中的表现）等过失，称在西方反华势力收买者的接应下抛弃发妻、与情妇远走美国后又出卖国家机密而被党开除；所举

“出逃”造成的“极为恶劣的影响”有反华势力施加压力、“六四”一周年时几十万人游行，他对有人在新华社门口打出“周南应向许家屯学习”的横幅愤恨不平说：“向他学习，那我不是成了叛徒？别做梦了！”许写作此重大决定一直对老伴保密是“为免却因感情而节外生枝，也考虑事后也许可免去株连”，29日晚与她和深圳的女儿们“话别”时她们毫无察觉自己离别的痛苦心情，“我又一夜未眠”；30日下午七时左右老伴按原来打算乘火车回南京，“我对她谎称：再过两日，将乘民航回宁（南京）。思念及此，实愧疚万分！”由此可见他以“去国”轻描淡写的“弃国”之非同小可是连对伴侣都不敢道出的，联想官方以警卫员都不跟从的事实来强调张国焘投靠国民党、林彪“私奔”苏联的不得人心，以及身边人回忆中有真伪不详的林出走前对家人流着泪说“我至死都是个民族主义者……”，⁴¹⁾则不知许是否也顾虑一旦对妻吐露则“千古罪人”的恶名恐会遭反对甚至举报而致不得成行。张1938年4月4日（清明节的前一天）以陕甘宁边区代主席的身份参加国、共两党同祭拜黄帝陵之际，称去西安有事而打发护送者回去，只带了一个警卫员就上了国民党方面的汽车，而这位建党人之一17日在武汉自绝于党时就只是孑然一身。11日他对周恩来、王明等人赶来规劝回心转意只回应以写致毛泽东、张闻天（时任总书记）的电文：“弟于今晚抵汉，不告而去，歉甚。希望能在汉派些工作。”17日周摊牌提出三条供选择：“一、改正错误，回党工作（这是我们最希望的）；二、向党请假，暂时休息一时期；三、自动声明脱党，党宣布开除党籍。”张以缓兵之计等周、王等离去后便逃离八路军办事处而投入国民党怀抱、声明脱党，⁴²⁾中央第二天即决定开除党籍所显示的不容叛变的铁则52年多后用到了许家屯身上，而和上述妥协案中的“请假休息”相似的许之“旅游休息”在近22年后出现了效法者。

2012年1月28日王立军向薄熙来反映谷开来在英商命案中的嫌疑而遭打耳光、摔茶杯，薄为阻止追查真相而在未按规定征求公安部允许的情况下擅自撤销其兼任的市公安局局长职务，市政府办公厅2月1日公布其副市长分工由公安、司法、维稳等调整为教育、科技、环保等。王2月初与英国驻重庆总领事馆电话预约会面（未赴约）后6日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与美官员就环境保护、教育、科学技术等事项作短暂交谈后提出寻求政治避难并写了申请书，经美、中之间及各自内部的交涉、协调后次日王自行离馆、随国家安全部副部长邱进等赴京。8日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发布消息：“据悉，王立军副市长因长期超负荷工作，精神高度紧张，身体严重不适，经同意，现正在接受休假式的治疗。”9日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应询答时表示：“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于2月6日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滞留1天后离开。有关部门正在对此调查。”和薄、谷同归于尽的王获徇私枉法、叛逃、滥用职权、受贿四项罪名而被判15年徒刑，许家屯退休后的出走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履行公务期间，擅离岗位”而不构成叛逃罪，而被市府以“休假式治疗”名目遮掩的王向美寻求庇护像是步许赴美“旅游休息”的后尘。可解释王以身试法是因为所感到的人身安全威胁大于《刑法》第109条规定的量刑上限10年，与之类似的是张国焘叛逃

的动因之一据称是惧怕被王明以往昔整死异己的狠劲夺去性命，⁴³⁾许也是不愿遭软禁的生不如死才不惜失去 50 多年来的一切和被扣上大帽子甚至连累家小。先后分管维护稳定、环境保护的王立军讽刺性地要为维护生存而冒险寻觅保护性命的环境，许对不愉快之事憋气而去开创新天地的老来重新打鼓在受命赴港七年后又表现为离港亡命。奇巧的是张国焘在国民党阵营失宠后于内战期间弃官从文在上海创办反共新闻周刊《创进》，1948 年冬逃到台湾后因尽管是第六届中委（1945—52）却受冷遇而于次年冬移居香港，“文革”波及香港后为躲避冲击而于 68 年选择的新天地也是同在北美洲的加拿大。

1956 年中共八大（9 月 15—27 日）召开后张见国内政治空气宽松而萌发落叶归根的念头，但对中央以悔过为回国前提的条件又碍难接受而终于在境外度过其后 23 年的清苦寂寞的余生。⁴⁴⁾和毛泽东享年（82 岁）相同的人生里恰于中点的叛党起的后半生内可算惟一传世的足迹，是 61 年应美国堪萨斯大学之约撰写、四年后完成、版权费使数年生活费有着落的《我的回忆》（[香港]《明报月刊》66 年出版）。出走 11 年后同样想回国但不乞求的许家屯随遇而安地说“要论安享晚年，还是住在美国安静”，他受到早有精神准备的“政治死刑”后以写《试论和平演进》和回忆录作出针锋相对的回应，其理由是离境前已表示自己或家属如继续受迫害就将被迫不遵守四条承诺，结果他们不放手地开除党籍并非难“背离人民”。（新华社 91 年 3 月 3 日电《中顾委中纪委决定撤销许家屯委员职务开除其党籍》，称经政治局批准的该决定指出许“无视党的纪律”而于上年 4 月 30 日晚“私自出走国外”，“党组织曾多次对他进行耐心的教育和挽救工作，但他执迷不悟，至今不归，且与反共势力混在一起。许家屯身为党的高级干部，他的行为背离了党和人民，在国内外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完全丧失了共产党员的条件。”）

“我一向对写回忆录兴趣不大，总感觉到自己满意而又可供别人欣赏的事不多。对有些熟人写的回忆录，自夸自大，‘虚报冒领’他人成就为自己有的行为，更为反感。可是，现在变了，要写回忆录了。/鬼使神差，临退休之年，碰到所谓‘六·四’事件，被卷入地方官原可置身事外的宫廷之争。一个五十多年忠诚的共产主义的信徒，‘旅游’到资本主义美国‘休息’。这对中国共产党，对我自己，都是极大的讽刺！本来想都想不到、更极不愿见到的事，竟成为现实……。[省略号为原文] / 决心写的原因有二：一、留点资料，作为历史见证，供人参考；二、暂时由江泽民、李鹏掌权的中国共产党开除了我的党籍，一时间回不了大陆，为稻梁谋，换点稿费。”在回忆录《前言》中如此表白心迹的许 2008 年 1 月因感冒引发肺炎后又跌断肋骨，此前不久向媒体作“流落异国十七八年、风烛残年、孤独的九二老人对回忆录的补充”时，则次序颠倒为第一是为稻梁谋，第二是写下资料供大家参考。关于前者又借题发挥否认有人指责的贪污，说出来时只带了一万港币而要吃饭，又称刊出第一篇文章《试论和平演进》的[香港]《信报》给了两万美金，回忆录得到几十万美金版税，自己的房子就是这么来的。⁴⁵⁾

亦体现于报酬的该回忆录的价值之一有如《前言》自述的，是围绕中国收回香港这一错综复杂的问题而事件层叠、充满矛盾、冲突不断，有关各方见仁见智、各执一辞之中作为曾处于历史漩涡中心的当事人的回忆就引人瞩目。许自信作为当事人提供的第一手资料尚有一定历史价值，同时顾虑手头没有资料而全凭记忆，对亲历的事情还可以说得较具体，但中央方面的文件引证全无可能，在现实情况下有时很难做到准确；又称翻阅了大量的香港报刊、书籍的有关内容，借此刺激回忆和增强准确度，总算整理出了往事的头绪，增加了信心。14年后的上述访谈中提到想要能美、中两边走走的重要理由之一，“就是要写回忆录，光凭记忆也不行，得回江苏去查查当年报刊资料”，而能弥补香港出版物之不足的江苏及大陆的报刊资料恐怕也难以挽救《前言》中坦言的缺憾：“我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开会不做笔记，平生没有写日记。凭脑子，记‘精神’，是优点，也是缺点。对于时间、地点，我一向大而化之，以为不具‘精神’因素，不储入记忆元件。现在要用了，可就‘抓瞎’了。我只能做到力求准确，但错讹之处很难避免。”许称“若有研究者或读者发现错讹，并不吝赐教，我将万分感激——不，是十二万分的真诚感激！”而这一诚恳请求的必要性在第一章《受命中南海》开头的重要场景中便显现出来：“一九八三年春节期间，邓小平全家在上海休息、过节。春节后，全家到苏州。我从南京赶往苏州，陪同邓小平游览苏州园林、郊区名胜古迹，参观人民公社。那几天，邓小平全家都玩得很愉快。我们同乘一辆面包车。一路上邓小平谈笑风生，经常抱起邓楠的女儿——他的小外孙女逗笑，也不时听我说明沿途的景物。很少涉及工作。”许作为第一书记陪同视察这一毋庸置疑的史实由此文得到证实，但官方年谱表明邓是2月6—9日视察苏州、9—14日视察浙江，因而这年过春节（13日）应不在上海而在浙江；《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所收《视察江苏等地回北京后的谈话》，就是3月2日视察江、浙、沪回京后同中央几位负责人谈话的要点，第一句即称“这次，我经江苏到浙江，再从浙江到上海”，所以许记述中的邓带家人在上海过春节和节后到苏州是双重笔误，如作尽量保留原文的修正则可考虑为“春节期间，邓小平全家在上海休息。之前，全家到苏州”（抵沪的年初二及其后若干天可算作春节期间）。

其原因想来有邓春节前后到沪旅游休息的惯例形成记忆误区及手头缺乏供确认的资料，而这一差错使自称可以说得较具体的亲历之事也因全凭记忆而不免要打上或小或大的问号。历史正如质疑叶剑英“大闹京西宾馆”细节的李晓航文中所称是由无数真实细节串联起来的，而一个细节的失真除了“可能导致一个历史事件的扭曲”之外也会使相关细节产生连锁偏差。“我从南京赶往苏州”对照上述史实则意味着邓节前到苏州时不是坐由京南下必经宁的专列，或是节前一度驻足上海之后赴苏州，而该细节是否属于邓节后从沪到苏这一前提所致的出入还有待作者或出版社查证乃至修正。不过不妨宜粗不宜细地着眼于地方长官对驾临辖区的中央首长毕恭毕敬、必躬必亲这一宏旨，许家屯回忆录的这类细节瑕疵让人联想“鹰有时飞得比鸡还低，但鸡永远飞不到鹰

那么高”（列宁喜爱并引用的俄国作家克雷洛夫的寓言《鹰和鸡》语）。1956年起他以省委书记、副省长为起点在江苏担任领导工作达约四分之一世纪之久（自述“‘文革’时期被打成‘走资派’，中断了四年。[略]到一九八三年，已在江苏省领导岗位上工作了二十七年”，而如果算上中断四年则似以“实际工作了23年”或“跨时27年”为宜），曾是全国最年轻的省级领导之一及总揽党、政数年的经历使其有关该省的叙述自有名牌溢值。试以戴心思2009年追忆“那次小平同志在苏州共3天时间，住在南园宾馆”时的介绍——“这个宾馆在市区闹中取静的地方，现在普通百姓只要付钱都能住得进去”，对比许回忆录中“邓小平下榻南园宾馆”之后的详述：“南园宾馆原先是蒋介石的前妻（大概是陈洁如）的住宅。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苏州市政府将几座国民党官员的住宅——当时称作‘逆产’——没收，合并改建为招待外宾和高级领导人的宾馆。林彪看中了这个地方，在六十年代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又专门拨款为他在在此新建别墅一座，让他长期居住。这座别墅，可供林彪足不出户享受日光浴，他的老婆叶群在室内游泳。邓小平全家，这次来就住在这座别墅内。”这段话揭示了“文革”前期正、副“统帅”在政治合作的初期即有共通的支配欲、享受欲——1959年庐山会议（7月2日—8月1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常委扩大会议，8月2—16日的八届八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就住在旧时蒋介石、宋美龄夫妇的别墅“美庐”；会前回湖南韶山故乡时向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等提出想在此山沟里建“几间茅房子”供老后住，结果也在三年国难期间的60年下半年至62年耗巨资兴建了毛只光顾一次（11天）的滴水洞别墅。

许知情并披露的林彪夫妇之奢侈作为那个时代即暗中有政要特殊化的事例富于史料价值，可惜对1952年起成为来苏的国家领导、外国首脑、社会名流的接待、下榻之处的宾馆介绍有误，这座园林别墅式宾馆是蒋在苏别墅“蒋公馆”等的所在地，曾寓居在此的蒋前妻是第二任夫人姚冶诚而非第三任的陈洁如。⁴⁶⁾但认为不够“精神”而不储入记忆或未费神查询的缺憾与勾勒出真髓的贡献相比不算什么，因为“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之“骨·心”由这笔刻画而终为小圈子外众人所知。有趣的是新任命下达后江苏有些干部不了解香港新华分社负有特殊使命、享有较高待遇（对外名义上的分社社长正业为港澳工委书记，工委在许到位时升为省级单位），将其同本省真正搞新闻的新华分社（省厅级）等同起来而以为是改行降级使用。《文革后期我与四川省委书记的交往》在以“改革难，要想在乱时谋改革更难”开头的引子之后，就写原不认识赵紫阳的自己几年前任新华社江苏分社社长时在省委扩大会上最初听到这个名字，历任新华社党组成员、摄影部主任的作者孙振才是真正搞新闻的，然而单看上引的原文（名字用字母代）则连“几年以前”大概是指认识赵前之意都不明确；下一段落倒是写了“纯属巧合”的相识的时期——上世纪70年代初可能因“文革”造成的混乱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而需要在省际之间交流干部，自己从江苏分社调到四川分社任社长，赵不久也从内蒙古调广东省委，又调到四川做省委书记兼

成都军区政委，但赴赵川上任其实是 70 年代中期的 75 年 10 月。该重头文章的责任编辑即卸任中国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后任《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的杜导正，这位历任新华社河北、广东分社社长和《羊城晚报》、《光明日报》总编辑的资深报人也未计较，二者对时间这一报道的基本元素似乎也和国家通讯社分社长掩护身份的许家屯一样爱大而化之。可是应当指出这篇传闻使杜以年龄过大（时年 85 岁）为由受到劝告退休压力的回忆，个别被较真者在细节上咬文嚼字之处也全然不影响其社会反响和历史意义。

以上对《邓小平在苏州首提“小康”概念》的诸多“挑刺”是因何建明为报告文学名家，获取、确认信息的广度、精度当远非身在境外、年事已高而难以检索国内资料的许家屯可比，然而老家省份往昔的那位“父母官”重“精神”而轻时间、地点的大而化之倾向也见于这篇。2013 年 7 月 10 日“中国报告文学网”发布的《邓小平的梦想在这里实现——一个中国乡村的史诗》，在“开篇记：1983 年，小平同志在我故乡说出了他心中的一个‘中国梦’”之下将上文回锅再炒，其中不知是自行觉悟或是经研究者、读者指出而订正了若干处讹误，如十一届三中全会不再写于人民大会堂举行，“他怎敢问邓小平”的“他”换作了“她”，可是这两例修改又向“文革”后推倒冤假错案过程中常见的那样不痛快地各留一条“尾巴”：三中全会上邓“代表中国共产党人向全世界宣布：中国要在 20 世纪末初步实现现代化”云云，去掉了“再次”而保留了有问题的“向全世界宣布”和“初步”，“代表中国共产党人”又生出有授权否的疑团而还不如原先的“明确地宣言”；人称代词回到本性之“她”的“王翻译”仍作“时任外交部亚洲日本处副处长王效贤先生”，“先生”固然“有时也尊称有身份、有声望的女性”（《现代汉语词典》释义）而不算绝对错误，但实际上被称者仅限于孙中山遗孀宋庆龄、廖仲恺遗孀何香凝、芭蕾大师戴爱莲等不多人，王效贤在作者心目中如真称得上寥若晨星的“国宝”级则“王翻译”之称不太敬重，也更显出当初误认为男性太不应当，在“女士们、先生们”的尊称普及的今天不用“女士”而以“先生”称王未免偏离规范。而更匪夷所思的是在改善或不彻底的改良之外还有一批“改恶”（日语，指反而改坏、越改越糟），如上述所谓十二大上邓一再强调的几句拼接起来的话加上了引号而成为更荒唐的直接引用，连开幕词都敢改动正式版本的手法使未见官方发表的一些其它邓言引述更减弱了可信度；又如原先的“次年，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目不转睛地盯着中国现代化的总设计师，这样问道”，改作了不甚妥当的“当年，与中国建交不久的日本国首相大平正芳曾目不转睛地 [下同]”，这首先不像点出是中全会的次年那样明确，从恢复邦交（“建交”不符合官方提法）经过七年算“不久”也比孙振文中的“不久”更离谱，这大概是把上年两国政府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不于是这年元旦的中美建交）和 1972 年的里程碑相混同了。

本篇称家人说打从日本回国以后的一段时间里“老爷子”的嘴里有几回突然冒出“小康”二字，上个版本中这一变化却是“这次与日本人会见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的事，本篇也有“小平同志

看了一眼日本客人，没有立即回答，只见他习惯性缓缓地点上一支熊猫牌香烟”（新加的“习惯性”以“习惯性地缓缓点上”为通顺，因为后缀“性”加在名词、动词或形容词之后是构成表示事物的某种性质或性能的抽象名词或属性词），可知是指1979年12月6日的会见，作上年10月22—29日访日归来后的提前一年不知是邓家人的更正还是作者的拔高或疏忽。向身边工作人员提出去江南的邓对去苏州的建议回答“去江南不去苏州去哪儿？”之后，旧作的“‘老爷子’话不多，但一旦说出来，就是掷地有声”这一突出邓作主的描写变成了：“小平反问。/‘好，去苏州。’家人和工作人员好不兴奋。”以家人和工作人员的反应取代作者评述的这条改换因去主观、求客观而提高了史料价值，此次江南行选中苏州的过程也可见政要的日常生活乃至社会活动中家人和工作人员的影响力；“89波乱”中有“愤（怒的）青（年）”揶揄“十亿人民跟党走，党跟小平走，小平跟着感觉走”，⁴⁷最后五字取自1952年生于台北小康之家的“young women”苏芮1986年唱红的歌（陈家丽词，陈志远曲），在大众“白天学老邓（小平），晚上听小邓（丽君）”的年代里风靡大陆的此曲的标题之妙，也体现在可适用于对大平首相的意外提问思索片刻即完整对答和在身边人鼓动下前往苏州。首次道出的“小康”设想看似随感而发的“脱口秀”而其实是基于实情、原理深思的产物；在和杭州并列为“人间天堂”的苏州小憩期间发现了农村致富典型经验和许家屯这位能吏，也能以“无意插柳柳成荫”的收获肯定其“跟着感觉走”的敏锐本能会带来积极效应。由此对照92年初邓以87岁高龄“南巡”就可感到暗含对“有心栽花花不发”的焦躁，而那番人生最后一搏所深植的观念和培养的后继人在香港回归前夕他逝世后得以隔代而出。再回味《邓小平的梦想在这里实现》对《邓小平在苏州首提“小康”概念》的“调味升级”，又好像听到了“跟着感觉走 / 紧抓住梦的手 / [略] 跟着感觉走 / 让它带着我 / 梦想的事哪里都会有”。

“‘翻两番，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这就是20世纪后期的一位中国圣者说的话。这位圣者叫邓小平。”《在苏州首提“小康”概念》的这段开篇到了《梦想在这里实现》中经装点而换新颜：“每个人都有梦想。小平同志也不例外。/小平同志的梦想，就是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亲口说出的要‘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邓对社会发展蓝图的这一著名表述是1984年3月25日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所言：“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八百美元，就是本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翻两番、小康社会、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些都是我们的新概念。”《梦想》的引用同样缺了“本世纪末”这一期限，但比引文内对中间跳过20字不加省略号的《首提》在形式上显得完备些；然而作80年代初而非中期的粗略就和其后的如下表述一样给人以稍嫌轻视时间元素的印象：“时任苏州地委书记的戴心思对小平同志来苏州视察的行程和活动内容最清楚。戴老，这位1940年参加革命工作的南下老同志，在医院里接受我的采访时已83岁，几年后他逝世于苏州。”时任职务和访谈时年龄比旧作清晰的改进又伴随“几年后”是至本

篇问世的四年中的哪年这一问题，如能提供过世时日则能填补互联网上的这一信息空白并提示自己所谓“几年”的时间尺度。

两文还都写邓离开“没几日”戴接到邓办电话要核实苏州农民住房是人均超40平米否，“电话挂掉不几日，小平同志在北京找来中央分管经济工作的几位领导谈话”，以下大段引用的邓言即取自上述3月2日所作《视察江苏等地回北京后的谈话》。“几”正如《现代汉语词典》释义的是“②数表示大于一而小于十的不定的数目”，2月9日后这两个场面即便按“几日”范围内最大限度的九天算也分别于当月18日、27日，何况前加强调短暂的“没”、“不”而使“几日”对照该文内前出的标准当不超过四天（戴老接受采访到去世的最多为四年的“几年”都未加“没”或“不”），大概是因不在意、未确认而不标日期的写法倒也有避免敏感的读者从文中挑毛病的防御机能。但凡用笼统的“不多天后”即无问题的这段中“小平同志办公室”来“保密电话”的情节，和上述另处访谈中戴所称“后来，中央办公厅还专门核实[略]具体数字指标是否属实”亦有出入，而那次采访记录有“说到动情处，老人的手指不停地轻敲桌面”等细节而相当具备可信度。作者的宁粗勿细也见于《首提》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于1978年12月而不具体到18—22日，《梦想》则像把婴儿连同洗澡水一道泼掉那样将重要的时间和不重要而有误的地点一并删除，不过《首提》亦沿袭的十二大于9月初召开之说又让人悟到惯于粗线条者想要细也并不容易，同月1—11日的会期作“月初”和84年算“80年代初”就是拦腰一劈两半的痛快分割，而《首提》的“2012年11月中旬，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又由于实际为8—14日而与常识及上述的跨中旬前半截也算“月初”的自身标准相抵触。《跟着感觉走》所唱的“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 / 突然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我”般的信缰跑马，以及“脚步越轻越来越快活 / 尽量挥洒自己的笑容”的随意忘形都跃然纸上。

《首提》称邓的“小康”之梦是在美、日等西方国家看到飞速发展的世界文明后萌生的，后来的新加坡之行（未写的日期是1978年11月11—14日）使他有了东方式的“小康”概念，《梦想》则以紧抓住“紧抓住梦的手”的手改为新加坡之行使他渐渐成熟了自己的“中国梦”。这一移花接木的由来是恰于邓访新结束34周年之际闭幕的十八大后新总书记呼唤的“中国梦”，该文一字不差地引用习近平29日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发表的讲话中长达186字的片断，起首的“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梦想”即投影于该文开头的“每个人都有梦想”；接着写12月8日习以到深圳莲花山向邓雕像献花圈并三鞠躬之举向世人宣示要继续改革开放，这段中令人遗憾的是在明示日期的同时顾此失彼地把敬献仪式的点睛之物——花篮错作花圈，以及没有强调习的深圳之行是十八大后巡视地方的首站，因而未能和文中亦引用的上述邓言这次经江苏到浙江、再到上海，以及戴心思在其它访谈中提到的邓十二大后离京首站选择江苏、亲临苏州⁴⁸⁾相联系；诠释习还意在表明要全面推进建设让人民更满意的小康社会云云也未免牵强，习当场宣称的坚持

走富国富民之路和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核心内容的“中国梦”，毕竟在字面、层面上都是有别于三分之一世纪前邓构想的“小康社会”、“中国式的现代化”的升级版。将二人之梦相互融合、转换的此文不知是无意还是有意地把“中国梦”归溯到了邓的名下，相反地也把“习梦思”（谐“席梦思”音的谑语，指习近平的“中国梦”构思）移到邓的时代。《首提》中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再次向全世界宣言中国要在20世纪末初步实现现代化这句后，以“西方人开始警惕这头东方睡狮的‘觉醒’，他们显得有些紧张”引出大平向邓发问的场面，《梦想》则比单成一段的这行长几倍的两段官方气息浓烈的时髦高论来作“时光旅行”：“这是一个东方雄狮的一次响亮的嚎[原文如此]声，令西方人十分紧张和警惕，他们以各种方式在探究其含义，甚至放弃了老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观念，认为再用和平演变想动摇强大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的人民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成了泡影，于是改变为表面合作拉拢、背底[原文如此]疯狂组织力量围堵或直接挑衅中国主权与向外发展的中国经济，用尽一切办法企图扼杀崛起的中国。/但中国依然在坚定地走自己的路，且越走越强盛。于是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好奇心和试探性也随之增加。”

“嚎声”之所以叫人惊讶是因为“嚎”只有《现代汉语词典》条目列举的两个意思：“①[动]大声叫：一声长～|狼～。②同‘号’（háo）②。”（“号[háo]”②释文为“大声哭：～哭|哀～。”）“嚎”打头的四个多字条目中“嚎哭”、“嚎咷”、“嚎啕”的“嚎”都同“号”，惟一属①的“嚎春”释义作“[动]有些动物发情时发出叫声，因多在春季，所以叫嚎春”。这诱人联想江西宜春市“旅游政务网”2010年初春涌现的广告语“宜春，一座叫春的城市”（推上首页的2月8日和27年前邓小平游太湖的这一天分别为腊月25、26），该市旅游局为刺人眼球而推出的可有双解的雷人戏语当即引心明眼亮的广大网友冷嘲热讽，“嚎声”未引起反响可能是因为浏览并留神者尚少或不像“叫春”之谬容易激起“性趣”，也可能是上头“看官”（借此词字面谑指审阅的官方部门）不拘小节、一般观者不以为奇。眼下网上发布的书籍、文章中输录不当、校勘不细而致的低级错误时有虱子附体的印象，如境外某网站（其名在大陆属“不敢说，非常不敢说”的“黑帮”类）所载《许家屯回忆录》，主要为同音字混淆的以下这类错别字之多和可笑甚至难免使人怀疑电子版编制者的识字能力：“王瑞林在门口转了两趟，见邓小平和我谈兴正浓[浓]，就走开了。”“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党[当]政，宣布‘全国经济濒临崩溃边缘’。”“我担心邓小平批评，就先来了个自我检讨，说我们说[是]‘钻了国家政策的孔[空]子’”；“这是[时]，王瑞林进来催吃晚饭，我起身告辞”；“我下决心接受新的挑战，说道：‘感谢中央的新人[信任]，我去！’”其余像把“上午”作“商务”之类的笑话也似出自熟悉汉语拼音但不注意确认字形者之手，“空子”成“孔子”令人想起《智取威虎山》（上海京剧院创演，1958年首演）中“匪”参谋长的台词——“你怎么连山礼山规都不懂，你不是个‘溜子’，是个‘空子’！”（黑话“溜子”指土匪[语自东北人称土匪为“胡子”，以“缙子”称匪帮]，“空子”指不懂江湖事理者。）伪装成“匪”（国

民党收编的土匪部队) 副官打入敌巢的解放军侦察英雄杨子荣从容对答:“要是个‘空子’, 也不敢来闯威虎山哪!” 借此掷地有声之言则可说外行、生手的“空子”大胆编排却不小心核实的“敢闯”时下太多, 从纪实作品的确认事实到发表文章的检点词语等的“带病过关”怪现象都早已让人见怪不怪。

何建明策划、组织百人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2日、23日), 于发表70周年之际以《百位文学艺术家手抄珍藏纪念册》的副题由作家出版社刊出。此举引起的反弹之一是在前言中歌颂《讲话》“至今仍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指路明灯”, 而邓小平1980年1月16日在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作题为《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 就已要求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一容易成为横加干涉的理论依据的利少害多的口号; 该文《结语》部分问世整24年后中央决定撤销“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所有成员的党内职务, 并作出调陶铸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宣部长、叶剑英任书记处书记兼军委秘书长等安排, 由此从组织上得到强力推进的“文革”全面铺开。《讲话》成为指导文艺“战线”的“圣经”, 在“文革”早被否定、以“唱红(革命老歌)”制造“左”潮的薄熙来刚遭罢免的政治环境中, 不少文艺家出于怀旧等心态参与、部分受“文革”迫害冤屈者回绝的这一活动从客观上讲, 不无出炉后两个月在由中央派副总理张德江主政的“雾都”涌现的俏语“我靠重庆”的味道——这四字是“宜春, 一座叫春的城市”被叫停而去了“叫”后引起争议的又一则城市广告语, 2012年7月初在重庆公交车上亮出的“重庆42℃, 利川24℃”、“我靠重庆, 凉城利川”, 是与重庆两区四县接壤、气候清凉的湖北利川市为推介旅游资源、希望吸引客源而精心创制的, 不料意为靠近、依靠的“靠”被“恶读邪解”(原创谚语)为近乎意作性侵犯的骂娘动词, 而本话题中的“靠”则取其依傍、依赖、信托等正规语义来指贴近、趋向、期待“重庆模式”。“靠”的“告·非”字形还暗合何建明为此书及一系列涉嫌“名利场”出丑而受到严厉责难, 如前中国报告文学家学会副会长杨匡满在《何大官人是怎样炼成的?——再问何建明》(2013年2月)⁴⁹中, 就不仅指出何在其任社长的四年中由作家出版社刊行13部自著是破坏行规的滥用职权, 更抨击在《讲话》“百人抄”的封面、扉页和版权页上标明“何建明主编”是欺世盗名(因毛著从来是“《毛泽东选集》编辑出版委员会”编的, 主任刘少奇、华国锋都不署名), 版权页上把作者从毛泽东换成抄写者“贺敬之、铁凝等”是天大的荒谬和笑话; 进而问责错误多达16处、错别字和随便乱加的都有的编辑出版极不严肃, 如王蒙抄的“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 态度问题, 工作对象问题, 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中最后五字原著没有, 为王所加或编辑人员分发时搞错, 黄济人、胡可所抄的几个“场”字的右半边成了“伤”字的右半边。

“一本合格的图书其错字比例是不能超过万分之一、二的, 《讲话》全文19900字, 错率竟达万分之八, 即使在今天也是对毛泽东大不敬嘛! 可这样的出版物居然还得了‘中国最美图书奖’,

滑稽至极！请问何建明是怎么运作这个奖的呢？”对杨的这一指责倒不妨从豪华阵容组装合制的这部“珍册”的特殊性质作一点小小的辩护，错率超出版界常规的容许上限几倍就一般出版物而言确是构成讽刺“最美”的不妙之事，不过其中数处“场”的不规范正如形旁误作“伤”的右半而不妨算作大可高抬贵手的“半伤”。即以毛的手书就能雄辩地证明伟人、名家的“贵手”笔下也难免出远不止“万一”的错别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中，就一再出现“他老人家”把通常写“逼”字的场合作“迫”的“半伤”（部首同、语义近），如第六章《“三反”“五反”》中关于纠正“用逼供信的办法打出了一些假‘老虎’”的偏差的段落，引用1952年2月9日毛致高岗并告各同志的电报称个别单位“已出现用逼供信的办法打虎”；22日转发华东军区“打虎”报告的批语要求“算大账，算细账，查清老虎真假，严禁迫（逼）供信”（以括号加“逼”是该书作者注明正确写法）；“二月二十六日，他在转发中直委‘打虎’报告的批语中，再一次强调：要材料，要证据，严禁逼供信，指出这‘是目前打虎作战能否取得完全胜利的关键所在’。”脚注说明根据手稿的这三条引用中9日的“逼供信”和22日的“迫供信”都是冒号内的原文，26日的“逼供信”则在冒号外而不排除是为和本段开头作者亦用的正字统一而回避直接引用。9日作“逼供信”证明“迫供信”这一“毛（兼指其姓）病”是明知“逼”对却惯写“迫”，第34章《发动“文化大革命”》所引66年7月8日致江青信中就有“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第37章《八届十二中全会到九大》所引68年12月1日对北京新华印刷厂报告的批语，第1540页登载的文件首页影印上的“御批”真迹也是写“严禁迫、供、信”，上页正文中以冒号引用的该部分却作“严禁逼、供、信”而不采取“迫（逼）”的处理方式。同一张纸的正、反两面的这一差异不妨视为另类“美言不信，信言不美”的例证之一，而手迹已无存的那封致江信中的“迫”不像众多书刊改作“逼”又显示了官方传记的严肃。

在韶山滴水洞“行宫”写下的这封信据《毛传》称先给在武汉的周恩来、王任重看过（王时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以后由周把信带到上海交给江，又委托周到大连向林讲了内容。因有猜疑“我的朋友”（林）“为了打鬼，借助钟馗”等微妙内容而烧毁原稿、抄件存档，林出事后为显示早已洞察其野心而向党内外公布的此信又被认为是他首肯由张春桥等伪造的，据称“他（蒋介石）就逃到一个海岛上去了”改为“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是参与作假，1972年5月21日—6月23日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散发有两处改动手迹的抄件也有说是要使人信以为真。⁵⁰⁾这份文献假若真是捏造的则要赞叹炮制者对领袖的思想、风格及细节都把握、模仿得绝妙，如“迫上梁山”就可叫人以为这一“鹰有时飞得比鸡还低”般的不标准写法法定为毛手笔。由此想到《红楼梦》第五回里的“太虚幻境”的对联“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毛传》建政后部分第37章引68年5月11日关于武斗、造反等问题的讲话中有“搞逼供信，不讲也得讲”，又有“凡是拼命地逼，他就会供，供了你就会相信，又会要许多人这样

去供。这样做也不好”，如此看来除非老家方言可说“逼”为“迫”则毛口头表述还是通常的“逼供信”。第39章《一九七二年的内政和外交》根据手稿引72年8月11日、12月5日的两条批语：“在原高级党校校长林枫子女的来信上批示：‘我意放他出来治病。林枫问题过去没有搞清楚，有些证据不足，办案人员似有一些逼供信。’在被迫害自杀的原马列研究院秘书长柴沫的妻子来信上批示：‘似不应除名。（逼死了人，还要开除吗？）’”从后者的“逼死”可推测前者的“逼供信”之“逼”大概没有写成“迫”，但手稿影印件中的“迫、供、信”正文作“逼、供、信”的上述修改又使原样无从知晓。然而毕竟前面的“迫（逼）供信”和“迫上梁山”已显示毛有把“逼”写成“迫”的习惯，其诗词中“迫”有《西江月·秋收起义》（27年）的“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30年2月）的“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63年1月9日）的“天地转，光阴迫”、《杂言诗·八连颂》（同年8月1日）的“不怕压，不怕迫”，“逼”则只有《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31年夏）“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从“迫”多“逼”少也能理解毛是把平素分得清的这两个字偶因笔误而将“逼”作“迫”。

上述两位“雄文”抄家的“场”字走样对照毛笔走龙蛇之中把同是走之底的两字混同，则不妨引毛1975年7月25日对《创业》问题的批示而认为是“无大错”、“不要求全责备”。这年春节上映的该电影被“四人帮”以“给刘少奇、薄一波之流涂脂抹粉”等为理由欲加封杀，毛接到编剧张天民鸣冤的投诉信后对江青“不懂事，尽办些蠢事”大为生气而即刻写下批语：“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此信增发文化部及来信人所在单位。”《毛传》建政后部分第42章《支持全面整顿到“反击右倾翻案风”》记述因眼疾而字写得难以辨认，并用一整页篇幅展示断断续续、歪歪扭扭地写着上述批示中前一段及署名的六张纸的原件影印：第一、二张的“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 不要求全责备，”标点符号和整理后的都不同，第三张的“罪名有十条之多，太，”和第四张的“而且罪有十条，太过分”部分重复，第五张的“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之下奇怪地有和上一张中位置、笔迹一模一样的“，太过分”，第六张的“政策”后的句号写在“策”下方较远的“毛泽东”的紧上面。《毛传》所载墨迹以此零乱的手书作最后一份就凸现了抱病遥控的奋斗和病夫治国的悲剧，而顿时扭转局面的这组核桃大的字之不中看却中用以表里的反差体现了“信言不美”。接下去的最后一章《临终的日子》从毛度过的最后一年——76年的元旦写起：“当天，全国各大报刊都在头版刊载了他十几年前写的两首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标题下方，印着笔迹颤抖的‘毛泽东’签名。”全无往日“毛笔”（谑指毛的手笔）之龙飞凤舞的不美的真迹传递了“龙体”欠安的真实迹象，5月27日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的电视报道更不加掩饰行将就木的苍老、气息奄奄的病态。憔悴的面容、呆板的表情、迟钝的动作和拿沙发扶手上叠放

着一擦的纸巾来擦口水的镜头等，中央6月宣布毛今后不再见外宾和3月8日天降吉林的特大陨石雨同样预示了“今年祖龙死”，都可对比将其牙齿因不良习惯的黝黑色抹去的“洁版”照片⁵¹⁾而想到“美容不信，信容不美”，受到质疑的《讲话》“百人抄”之“最美”也不妨说在于得过且过、将错就错的原液原装。

毛就《创业》敲打江青的900年前苏轼在她的故乡山东诸城写下《江城子·密州出猎》，其中“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亲射虎”能用作毛发动和领导“文革”的写照，“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还不妨借化而言“场”的变形是“字微伤，亦无妨”。《百位文学艺术家手抄珍藏纪念册》的百家手迹又引人联想含“百·家·迹”三字的传统对联：“百行孝为先，论心不论迹，论迹贫家无孝子/万恶淫为首，论迹不论心，论迹世上少完人”（“百行”亦作“百善”；“迹”亦作“事”；“贫家”亦作“寒门”；“世上”亦作“终古”），上三位数的该群体正如“带头羊”贺敬之的姓名所象征的是多对此文及毛怀恭祝、敬仰之心，书法家欧阳中石因手抖写不好钢笔字而用毛笔抄录封面书名的佳话⁵²⁾也显“毛粉”量、质可观。江湖语“空子”另指的“受冤枉者”也适用于怀善良愿望参与而因一笔之差被冤枉点名之士，因为1965年2月1日《光明日报》发表的毛词《清平乐·蒋桂战争》（29年秋）手迹就不完善。被认为是毛诗词的权威阐释者的郭沫若同时在刊载的《红旗越过汀江》文中竭力美化几处笔误，先赞颂“主席并无心成为诗家或词家，但他的诗词却成了诗词的顶峰。主席更无心成为书家，但他的墨迹却成了书法的顶峰”，接着称“一枕黄粱再现”之“粱”写作“梁”是无心中简化了，对“直下龙岩上杭”多写一“龙”和末尾“分田分地真忙”下无句号也说是随意挥洒的证据，“然而这幅字写得多么生动，多么潇洒，多么磊落。每一个字和整个篇幅都充满着豪放不羁的气韵。在这里给我们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人，乃至从事任何工作的人，一个深刻的启示。那就是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抓活的思想第一，‘四个第一’原则，极其灵活地、极其具体地呈现在了我们眼前。”中共建政时即作为党外人士出任政务院副总理而堪称文艺界、学术界“超级大官人”的此公，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将他够得上是诗友的领袖之手书推到了荒唐的无与伦比的境地，滑稽得像是丹麦作家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装》中老大臣怕失宠而绘声绘色地讲虚构的“衣服”多美，其“混伸介述”（谐“浑身解数”音的谑语，指胡乱引申、恣意发挥）就差没给“龙龙”贴上“二龙戏珠”的誉称了。对“百人抄”中“场”字不到位的“吹毛求疵”和郭在疵中求吹捧毛的机会比就显得真诚，但若算大账而不计细账则应重视原著白纸黑字写着的“和学习问题”被认为属无中生有一事。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时为整顿科技工作而准备的汇报提纲中有“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在一些正式文件中亦作为毛泽东语录加黑体字的此言却在他向毛汇报时被指出不记得说过。提纲修改中因此删去后对所传出处的63年12月16日谈话记录里果然只有可视为宗旨相近

的一段：“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府、人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产。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⁵³⁾ 听取中央科学小组组长聂荣臻等人汇报科技工作 10 年（63—72）规划时的这番话确实难成根据，加上马克思说过“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等支持材料也不能使编制“最高指示”得以承认，在那个年代如此“胸胆开张”会像“按既定方针办”事件显示的那样招来“捏造圣旨”之罪。毛 76 年 4 月 30 日听取华国锋汇报工作时因话说不清而在纸上写了 3 句关于具体问题的话：“慢慢来，不要招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毛传》援引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未刊稿）的再现其场面及原话，澄清后来传第二、三句分别为“临终遗嘱”、指“定接班人”是不符合事实的。毛死后一周的 9 月 16 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中，有“四人帮”塞进的给人以“遗嘱”假象的“毛主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10 月 2 日华审阅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上的发言稿时针对这六个黑体字批示：“此发言有误，文中引用毛主席的话，我查了一下原件，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⁵⁴⁾ 戳穿拉大旗作虎皮的把戏顿时使对手从意识形态制高点上跌到被指控为企图政变篡权的困局，而毛亲笔写的三句话的 19 个字里也有比例远高于万分之一的一个错字。《毛传》中上述张文所引的“招急”不改作“着急”或加括号为“招（着）急”，却又和 66 年 7 月 8 日致江青信的存档抄件据称的字迹稚拙⁵⁵⁾ 一样反因不“达”、不“雅”而可信。

毛建政初所言“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可以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也可转义当《讲话》“百人抄”被指责有白字、添加却被评为“最美”、洛阳纸贵的道理来讲。杨匡满对王蒙所抄部分“末行的‘和学习问题’5 字原著没有”的非难细究起来也要打问号，因为《引言》原文的第二段结尾明白无误地写着：“我以为有这样一些问题，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这里不妨注目于习近平参观《复兴之路》展览之际在讲话中表达主张时亦用的同样的谓语——“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现代汉语词典》中释义作“**认为**”的“以为”有三条未加注意说明的用例：“不～然 | 这部电影我～很有教育意义 | 我～是谁呢，原来是你。”吕叔湘主编《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商务印书馆，1999 年），则在释义“（动）对人或事物作出某种论断；认为”及 12 个不同类型的例句之后，还有**习用语**“自以为是”、“不以为然”的解释和“**比较**以为：认为”——“都表示作出判断，但‘以为’的语气较轻。/1) ‘以为’多用于与事实不符的论断；‘认为’一般只用于正面的论断。/2) ‘认为’前边可以用‘被’，‘以为’前边只能用‘让’。”以语气较轻、不专作在正面论断的“以为”作此重要讲话的“习（近平）

用语”似嫌稍弱，但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上述见解一脉相承的“我以为”又是温家宝爱用的，如2011年3月14日在总理任上会见中外记者时提出“当前，我以为最大的危险在于腐败”。同年8月28日他在农村教师大会上所作的题为《一定要把农村教育办得更好》的讲话中，称语文是整个学习的基础和学生与社会等交流的工具、国与国之间的桥梁、了解祖国历史文化的钥匙，这番强调和教育世家中受都是语文教师的双亲（父亲还教过历史、地理）熏陶不无关系，其“我以为”自有和习沿袭毛语的政治上的正统性相不同的语文上的正规性。《现代汉语八百词》中的头一个例句“我~水的温度很合适”和前面只能用“让”的规则，让人想到“以为”也许含表示自觉或有不当地而容人指教的谦虚、客气、温和，毛在延安整风开始三个月后、习在当选总书记两周后发表的讲话中的“以为”就不显武断。温习毛的经典言论时发现的温、习亦用的“我以为”还可诠释为群言堂中一家言的个人感觉，而低调、非绝对的“以为”在语感、机能上没有咄咄逼人地叫沿着言者意念走的高压、强势。

杨匡满对何建明的自以为是等“毛病”不以为然而致对“百人抄”的责备稍有憎屋及鸟（仿“爱屋及鸟”并谐“憎恶”音的谚语），易使人信以为真（“以为”的习用语）的“‘和学习问题’5字原著没有”就延伸伤至王蒙，被节外生枝地捎带指作画蛇添足者偏偏是曾任文化部长（1986年6月—89年9月）的顶级作家。《王蒙自传·大块文章》〔广州〕花城出版社，2007年）回顾1982—92年任中央候补、正式委员的经历，称香港出版的一些侈谈大陆政治“秘闻”的书一看中委、书记处会议的细节就知是生编硬造，他凭记忆引述亲耳所闻的领导人话语时就以这样小心的写法来避免可能的变样被当真照搬：“通过关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决议后，小平同志显得很兴奋，他即席说了一句：‘这是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大意）”《毛主席语录》（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编印）第一部分《共产党》的最后一段称：“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借《关于情况的通报》（48年3月20日）中的这番告诫则不妨认为上述“（大意）”讲究策略，表明涉足宦海若干年的此公深知透露、引述顶级领导人言论时务须充分注意而万万不可粗心。毛泽东治下不免要划成“政治性错误”的书写领袖语录失当倘若真出在有这份谨慎的王笔下，则又像是受毛注目后被打成“右派”、“89波乱”后不愿问戒严部队而丢官的此公命中注定。他被罢免的9月10日前已于8月31日由副部长升为代部长（至92年12月）的贺敬之也非无懈可击，所抄开篇《引言（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的第一页作为纪念册的“头面”在媒体上多有亮相，其中首段倒数第二句“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后的逗号位于第七行（每行15字）的开头，而横行书写的文稿里句号、问号、感叹号、逗号、顿号、分号和冒号按汉语规矩不可居行首，这些标点符号表示语气停顿而应紧跟句末，在一行的最后一格被句末文字占用的场合须点标在紧靠文字的右下角。中国作家协会所属国家级大型文学出版社对名家真迹中可谓真“逗”的逗号错位不加提醒，大概也是“论心不论迹”而不在乎大概

其（“其”亦作的“齐”在此则不合其形不齐）之故。[广州]《南方周末》的报道《“考虑到他们都是领头人物”——“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手抄本前后》（记者朱晓佳、实习生周鑫，2012年6月1日），就重点渲染他拿钢笔一笔一画地写完后又回头把篇首的“引言”两个字一笔一画地描粗。何建明评为“像书法家写的似的”这份墨宝上的逗号领行头和毛手书词末丢句号相映成趣，而这位专业诗人却有别于“随意潇洒”的毛泽东风格或上述书中自称“自由散漫”的王蒙习性，各字及整页都显得和“生动、潇洒、磊落、豪放不羁”相反的规规矩矩、干干净净、恭恭敬敬，以拼音字母打头同为 ggjj 的这三个四字叠词表现的印象又巧合下一位抄手姓名的“铁·凝”（仿“旗手·棋手·骑手”等、与“手抄”字序反的“抄手”在方言中有“馄饨”意而似不恭；上文中借“作家·艺术家·名家”等而创的名词“抄家”则是挂连其动词义、谐“炒家”音，以此谚语表达对批斗、抄家成风的“文革”中被触及灵魂的抄作者们仍怀“恋毛情结”的惊奇——非单数“炒作者”的复数“抄作者们”即《百位文学艺术家手抄珍藏纪念册》的“作者”群）。

《南方周末》报道所称《讲话》全文共 1.7 万字和杨匡满檄文的 19900 字说相差近二成，或因含标点符号与否等统计基准不同而来的差异说明后者没有为提高错率而利用前者的数据。出版社为使每人能抄上一段并衔接成整版而作划分一百小段的“文割”（谐“文革”音的谚语），以一视同仁的方针给寄回手抄稿者每人一千元稿费的“一刀切”引来网络围观者“切一刀”，大张旗鼓的“复旧”所遭千夫指叫个别抄者负疚像是应了“每·千”加竖心旁即成“忤悔”，该书发行的前一天（5月21日）南京作家叶兆言就在微博中为自己参加抄写做了几次解释。“作家出版社寄了一千块现金，要没头没脑抄一段。选择一，把钱用了，不理它。选择二，去邮局退钱，这事太麻烦。第三，抄一段。你会如何选择呢。”《南方周末》报道起首看似没头没脑地选抄其中一段的这条“卫搏”（谐“微博”音的谚语），其后还有“让网友一骂，有些后悔。不是把这事当回事，是太不当回事”；又对网友讽刺的“作家丢人榜”回应“确实有些丢人，黄泥巴掉在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生于“反右斗争”之年（1957年）的他为打消被当作毛“粉丝”的误解而冒出“愤嘶”（谐音谚语），享有“优秀的语言艺术家”等盛誉的其祖父叶圣陶（作家、教育家、出版家、社会活动家），在冥界恐怕要对他在叫人“恐·怕”的冲击波下慌不择词地用大便的比喻来答辩感到不爽。“譬如画家，他画蛇，画鳄鱼，画龟，画果子壳，画字纸篓，画垃圾堆，但没有谁画毛毛虫，画癞头疮，画鼻涕，画大便，就是一样的道理。”鲁迅在病故（36年10月19日）当月问世的《半夏小集》中所作的这一论断不妨用于此，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由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首发正逢鲁迅逝世七周年，该报创刊的41年5月16日还偏巧在“文革”进军号《五一六通知》的整四分之一世纪前。“屎”和属于次等不雅视听的“垃圾堆”可组合成的“狗屎堆”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有出条，这一“比喻令人深恶痛绝的人（骂人的话）”见于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宪政》（40年2月20日）：“顽固分子，实际上是顽而不固，顽到后来，

就要变，变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叶兆言当天 11 点 24 分至 23 点 10 分陆续发的四条有关微博中⁵⁶⁾最后一条也沾有毛的“语丝”：“吃苍蝇的感觉很不好，对于‘讲话’，自小没什么好感。我为自己的不当回事深深懊悔，有些事不能不当回事。在抄写时，写到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为人民大众，既觉得好笑，又觉得庆幸，今天似乎已没有这些词汇了。我以为它已经不能再伤害我们，但是事实显然不是，这个纸老虎仍然狠狠地刺痛了我。”其中“以为”用得标准的整段话中“吃苍蝇的感觉很不好”这句和“是屎”一样感觉很不好，而联想毛作于 69 岁诞辰的《七律·冬云》（62 年 12 月 26 日）的末句“冻死苍蝇未足奇”，以及毛《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46 年 8 月）所说“一切反对派都是纸老虎”（《毛主席语录》的第六部分标题即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对派都是纸老虎》），毛的言论在自称对《讲话》无甚好感的这位江苏省作协副主席的头脑里似乎仍是根深蒂固。

《南方周末》的特写中特写该纪念册的编辑不认可叶文中“要没头没脑抄一段”的说法，称在寄出何建明撰写的邀请函及要求抄写部分、用纸之前他给每位文艺家都用电话征得同意。双方的“卫搏”（保护自我的分辨）和“维驳”（谐音谚语，指维护形象的反驳）委实有趣，这场“多情却被无情恼”（苏轼词《蝶恋花·春景》末句）的喧闹过后以清醒的头脑回味起来，倒大可肯定文艺界的头头脑脑无“文人相轻”、多“官人相重”地聚集一堂的“有头有脑”。分担全书的老、中、青三代文艺家中贺敬之作为《讲话》精神的忠实而成功的实践者当之无愧，曾任第十二、十三届中央委员（1982—92）及中宣部副部长的党内资历、职位之深、高出众。邀请“第二作者”的理由是因以中国作家协会为主而“铁凝主席是当家人，要让领导先带头”，⁵⁷⁾这位 2006 年才 49 岁就当选作协主席的“young women”于 11 年连任后又当选中央委员，之前任第十六、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等“官人”经历和王蒙相仿而显出选人、排名不无官本位。她 07 年为 [西安]《美文》半月刊题词“《美文》杂志年方十五，风华正茂，英气逼人 [略]”，把“茂”写成“茂”的失误使继茅盾、巴金之后的第三个全国作协“掌门人”形象受损。《毛主席语录》1964 年 5 月 1 日初版的插页上林彪亲笔题词“读毛主席的 / 书听毛主席的话 / 照毛主席的指示 / 办事”中，“听”也因多写了一点而致“斤”成了“斥”，次年 8 月 1 日再版时才改正并补写雷锋自勉语的第四句“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以使“64 错版”收藏价值大增的林副主席一笔之差来看对铁主席添一点的斤斤计较乃至斥责，可想起毛《七律·吊罗荣桓同志》（1963 年 12 月）的“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其上的头两联“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官方、准官方见解作暗含对战争中和罗搭档的林彪在政治、军事上的动摇及欺压罗帅的针砭，其实未必的此诗之字面倒可借来表现毛、林的草上飞般的墨迹中个别相违并非难堪的大问题。

《现代汉语词典》的“冗”字条目加括号附列异体字“(冗)”于正字后，在象征蛇足之冗即为多一点的同时也显示出汉字的异体当今也受到一定的宽容。铁的这点伤和把这位主席作为那个

已故党主席的讲话的有限复制的作者之一相比就微不足道，当年作为毛的政治秘书整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成稿的胡乔木倘若地下有知，恐怕会对策划者自封为这一历史文献“杂色”（借王蒙小说[1981年]名）版的主编不以为然。台湾“总统蒋公哀思录编纂小组”编《总统蒋公哀思录》标明由黎明文化事业公司“恭印”，作家出版社及社长创意时若能想到“敬抄”、“谨制”名目则或许能抵挡“大不敬”的责难。如以“主编”是指对纪念册而非《讲话》而言为何建明辩护则同样有对书中出错负责的问题，而“中国报告文学网”发布的何文《邓小平的梦想在这里实现》中的“嚎声”之“不大敬”，按理说应为最终校阅者的作者因是网站主办单位——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的会长而有双重责任。铁凝任中国作协主席后仍兼河北作协主席（2007年12月起为名誉主席）期间有该省作家称：她“始终自觉地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工作和创作中自觉坚持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促进领导班子团结、廉洁自律，在团结和凝聚河北省作家队伍[略]等方面确实做出了特殊的贡献”。⁵⁸⁾贯彻铁则、凝聚群体这两条如其姓名的特性当为比“美女”魅力等更硬的“登龙门”理由，当选本届副主席的何建明以“弘扬主旋律”、打造“形象工程”走红也有赖于紧跟上意、时流。对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之公开言论的上述引用不当说明学习邓小平理论的认真程度亦不如铁，这句话末尾有三字正巧含于毛词《忆秦娥·娄山关》（1935年2月）的“雄关漫道真如铁”，而“雄·漫道”和此语上接的“马蹄声碎，喇叭声咽”不妨借来鉴赏“雄狮嚎声”的奇文。

注释（说明：本文因篇幅超限而省略作者以往在论文中引用时注明的个别文献出处，及部分书刊中的页码。）

- 1) 尼克松《领导人》（1982年）日文版（德冈孝夫译《指導者たち》，[东京]文艺春秋社，1986年），第253页。
- 2) 吴基民《周恩来与上海天安门血案》，[台北]一桥出版社，1998年，第137—154页。
- 3) 书中称“吴敬恒于1964年出版的《蒋总统年表》大本线装”，而以1953年去世的吴作为行为主体，似不如“1964年出版的吴敬恒撰《蒋总统年表》大本线装”妥当。
- 4) 参见[广州]《南方人物周刊》载记者施雨华《“刺宋案”罗生门》（宋教仁被刺100周年的2013年3月22日发稿）等。
- 5) 陈晋《独领风骚：毛泽东心路解读》，[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04年，第147—149页；权延赤《走下神坛的毛泽东》，[北京]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第41—42页。
- 6) 被定为“18号案件”的朱明匿名信事件始末，其时作为浙江省公安厅厅长奉命主持侦破的王芳在《王芳回忆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中有详述。
- 7) 参见《王芳回忆录》及张宝昌口述、张事贤整理《林伯渠夫人朱明：不可思议的自杀》（《人民日报》主办《文史参考》半月刊2010年第13期）。
- 8) 参见《“那是真正的人间地狱” 揭密秦城监狱的女人们》（“凤凰网”2013年9月26日）引木木《秦城监狱的女人们》文记述（原始出处待查核），2013年12月15日再次阅览确认（本部分引用网络资料下同）。
- 9) 何殿奎《我在秦城监狱监管的特殊人物》，[上海]《世纪》双月刊2009年第五期。
- 10) 邱会作《邱会作回忆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第438—440页。

- 11) 同上，第 438—439 页。
- 12) 纪东《难忘的八年》，[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 年，第 152 页。
- 13) 尼克松《领导人》日文版，第 254 页。
- 14) 卢荻《“二月抗争”后的叶剑英》，[广州]《南方都市报》2012 年 5 月 24 日。
- 15) 同上。
- 16) 会同李先念与参会的许世友、李德生、任仲夷、万里等九人的谈话，参见高屹《全面揭秘邓小平政治人生：历史选择了邓小平》（武汉出版社，2012 年）第二章《邓小平与历史转折》等。
- 17) 程华《周恩来和他的秘书们》，[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 年，第 190 页。
- 18) 同上，第 131—132 页。
- 19) 权延赤《走下圣坛的周恩来》（[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年）中《五次发脾气》一章。
- 20) 程华《周恩来和他的秘书们》，第 334 页。
- 21) 《军队整顿的任务》，《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 18 页。
- 22) 范若愚《在周恩来身边的日子里》，[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 34—35 页。
- 23) 王伟群《改变历史的 36 天》，[北京]《中国青年报》2008 年 10 月 15 日。
- 24) 《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4 页。
- 25) 高新《中国高级干部人脉、经历事典》日文版（即原版，田口佐纪子译，[东京]讲谈社，2001 年），第 63—64 页。
- 26) “阿波罗新闻网”2012 年 11 月 15 日报道《新华社一度删中央委员名单 秘密被曝光？》称：“凤凰网”、“腾讯网”、“中国青年网”先后于 11 点 33 分、34 分、47 分以“新华网”为来源作此报导，“新华网”却在刊登这条“新华社十八大快讯”后很快就删除了“入常”热门人选的八人名单，直到当晚 10 点 29 分才在《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实现新老交替》中重新放入。
- 27) 1959 年 6 月 24 日在从武汉前往长沙的火车上与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的谈话，详见程中原《领导者要勇于承担责任》（[北京]《党的文献》双月刊 2011 年第二期）。
- 28) 权延赤《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第 88 页。
- 29) 1971 年 10 月 4 日同军委办公会议成员的谈话，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年）第 1606—1607 页。
- 30) 程华《周恩来和他的秘书们》，第 336 页。
- 31) 何立波《洪学智为何能被两次授予上将军衔？》，[石家庄]《党史博采》半月刊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1 年 6 月 16 日发布。
- 3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 1490—1491 页。
- 33) 张玉凤《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北京]《炎黄子孙》月刊 1989 年第一期。
- 34) 记者尹传红《追问新版〈十万个为什么〉》，“人民网”2013 年 8 月 28 日转载自《科技日报》。
- 35) “苏州地方志网”载《苏州市志》第一章《中国共产党苏州地方组织》称 1983 年 3 月 1 日起全省实行市管县体制，《中共苏州市委历届领导人名录》中戴出任市委书记的时期为 3 月（市志以中共地方组织为首章内容颇具“党先”[仿朝鲜金正日时代的“先军”口号]的国情特色，名录栏目在届次、职务、姓名和任职时间之间有籍贯也有趣）。2 月已转任首任市委书记之说见注 36 文献。
- 36) 《戴心思 小平同志指示鼓舞着苏州人民的心》，收录于访谈集《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 苏州实践》（未标明作者，载于苏州市农村干部学院官方网站内的 www.ngy.js.cn/download.do?affixid=77）的 30 篇之首。访谈集开头以“今天，5 月 11 日，一个平凡而不能忘却的纪念日”，称颂 30 年前的今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本部分的【人物档案】称戴“1983 年 2 月苏州市委书记”。

37) 同上。

38) 参见《南方周末》记者钱昊平《党委“第一书记”今昔》(2012年7月12日)。

39) 详见刘金田、张爱茹《走出中南海的邓小平》([北京]台海出版社, 2011年)第24章等。

40) 顾保孜《红墙里的瞬间》,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9年第三版, 第71—83页。

41) 胡平《乱世佳人》,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1988年, 第182页。林彪之子林立果的未婚妻张宁则回忆林说“起码是民族主义者”(何力编《林彪家族纪事》,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9年, 第278页)。

42) 详见姚金果、苏杭《张国焘传》([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7年)等。周所示的三条选择的文字, 根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年第二版)第468页。

43) 详见刘继兴《刘继兴读史》([武汉]崇文书局, 2009年)第二辑中《王明与张国焘的两次较量》一章。

44) 贺吉元《陈公博周佛海等中共一大代表中的五位落伍者》, [南昌]《党史文苑》半月刊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独家发布(未表明的时期从该页的链接文章、栏目看似为2008年)。

45) 记者高伐林《多维专访许家屯: 回忆在香港工作的若干重大事件(9)》, [纽约]“多维新闻网”2008年6月16日。

46) 《南园介绍》, 江苏国泰南园宾馆有限公司官方网站。

47) 串田久治《天安门涂鸦》, [东京]讲谈社, 1990年, 第119页。时任爱媛大学法文学(人文科学)院副教授的作者是古代、中世思想史专家, “5.20”北京部分地区戒严令发布1周年之日问世的此书辑录、评述了“89风波”中的大量“愤青”言行, 作为他在华从事研究期间亲历的见证及见解富于史料价值, 可惜就在同页上出现了瑕疵——“‘^{シーシージウシー}实事求是’ (实践こそが真理を検証する基準である)”, 首先是把已为日语成语并载入若干种日本国语(语文)词典的“实事求是”之“求”误为“救”(日语中同音为“きゅう [kyū]”), “救”字上标的原语注音“ジウ”(jū)也说明未认识到应为“求”(通常对应以均读chū的“チュウ”或“チウ”); 把“实事求是”解释成“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原文直译)也属常识性错误, 被引用度极高的《广辞苑》(新村出编, [东京]岩波书店)第三版(1983年), 就在该词条中标明源自《汉书·河间献王德》, 释义为“依据事实去探求真理、真实”, 由此可见本文言及的论述得当、校勘完美之难。

48) 《戴心思 小平同志指示鼓舞着苏州人民的心》。

49) 2013年3月2日公布于“五柳村”(陶世龙个人主页“海外五柳又一村”)。

50) 一清《〈毛泽东致江青的信〉烧毁前后的复杂政治生态》, “一清媒体·凤凰网”2008年7月28日。

51) 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 1994年)称毛因不肯刷牙而牙全变黑, “未曾修饰的照片可清晰看见他微笑时露出的黝黑牙齿”(第98、100页)。

52) 记者朱晓佳、实习生周鑫《考虑到他们都是领头人物》——“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手抄本前后》, [广州]《南方周末》, 2012年6月1日)。

53) 详见龚育之《龚育之回忆“阎王殿”旧事》(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7年)对这场风波的追述。

54) 参见王忠人《〈光明日报〉发表“按既定方针办”一文始末》(《炎黄春秋》2003年第二期)。

55) 一清《〈毛泽东致江青的信〉烧毁前后的复杂政治生态》。

56) 参见陈立红《〈延安文艺讲话〉像传说的魔镜》(2012年5月25日, “草根网”内“陈立红的博客”7月6日发布)。

57) 朱晓佳、周鑫《“考虑到他们都是领头人物”——“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手抄本前后》。

58) “百度百科”《铁凝》条目的《人物评价》介绍。

(夏 刚, 立命馆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モラルのボトム・ライン
「**道徳底線**」と「**遊戯規則**」を破った深い**ざいごう**罪業と危険な賭け
—— 時代の潮流に逆行した薄熙来事変の教訓（一）

2011年の薄熙来夫人谷開来に由る英国商人毒殺は、共産党及び共和国の史上の一大醜聞と為った。翌年の薄熙来失脚と翌々年の薄夫妻を断罪する裁判は、毛沢東死後の権力の頂点で繰り返されて已まない政治闘争の中で、最も劇的で熾烈で破天荒で複雑怪奇な事変だと言える。毛の亡霊や「文化大革命」の悪夢の彷徨さまよいを感じさせる薄の放恣な言動と、時代への逆行を阻止しようとした胡錦濤・習近平両体制の果敢な抑制は、1989年天安門事件以来の中国政治の最大級の歴史的事件の一つに数えられる。

本稿では先ず、党中央政治局委員の夫人に由る件くだりの涉外殺人事件の特異性を、1960年代前期の嚴慰氷（政治局委員・党中央宣伝部長陸定一の妻）の林彪一家への「反革命」怪文書送付と比較し、上層部の構成員及び関係者にも見られる「道徳底線」（最低限度守るべき倫理モラル）への無視を指摘した。周恩来が政治局拡大会議で嚴の犯行に就いて陸を罵倒したという当事者の回想を巡って、不都合な真実の検証の困難さと一部の回顧録や実録文学ノンフィクションに於ける実事求是の精神の欠如に注目し、歴史の風化や社会の劣化に因る真相究明や深層発掘を妨げる多様の阻害要因に一石を投じた。

（夏 剛，立命館大学国際関係学部教授）

